

年

卷

期

2

5

第

第

# 再生

第五期

第二卷

論建國與專制

社會問題之解決的社會哲學基礎

論民主

從社會形態的發展方面談建現社會

選舉與代表制度

蘇聯計劃經濟之進行



王希和

朱亦松

吳惟平

辛宗三

鄭文海

孫寶毅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二月一日

# NATIONAL RENAISSANCE

VOL.

II NO.

5

FEB.

1.

1934

# 徵求推銷代售啓事

啟者，本雜誌材料豐富，爲國內有數之刊物，出版以來，頗受讀者歡迎。茲爲促進文化起見，擬增加各地推銷處寄售處，折扣從優。本社除現有代理者外，凡各省市區各商埠各學校，有願爲本雜誌推銷者，均請開具詳細店號地址，來函接洽爲禱。

本雜誌以後每逢一日發行。定閱全年國幣二圓，半年，國幣一圓一角，郵費在內。

再生雜誌社發行部謹啟

北平西城石板房

# 再生雜誌 第二卷第五期

## 目錄

- 論建國與專制……………王希和
- 社會問題之解決的社會哲學基礎……………朱亦松
- 論民主……………吳惟平
- 從社會形態的發展方面改造現社會……………牟宗三
- 選舉與代表制度……………鄒文海
- 蘇聯計劃經濟之進行 (Rollin 原著)……………孫寶毅譯



# 論建國與專制

王希和

近來一般政論家有一種很好的傾向，就是不作浮光掠影，空疏誇大之談，而漸漸地對中國問題作根本的研討。中國自辛亥革命以來，中間又經過一度國民革命，但是革來革去，政治仍是上不了軌道；凡百建設仍是紙上空談。如果僅僅是這樣，也還罷了；無奈這兩三年來，論外患則東北四省的地圖變了顏色；論內憂則土匪遍地，農村破產。在這樣嚴重的情況之下，有的人以為中國非再經一次革命不可；有的人則以為非以建設求統一不可。我以為中國現在像已經病入膏肓的人一樣，氣息僅續，最要緊的在於培養元氣；若使再鬧一次革命，那就等於服一劑虎狼藥，非使她一命嗚呼不可，而況革命的目的未必是純潔的。退一步說，假令即有純以謀全民利益的革命黨，但在這種外患內憂重重交困的局勢之下，這種革命能否成功，還是一個絕大的疑問。至於建設呢？那好像病人愈後所服的補劑，在現今四分五裂的局面，建設兩字真談何容易！語云「皮之不存，毛將安附」？所以中國問題歸根還是建國問題；因為國家都弄不成個樣子，一切的一切，從何說起？

## 一一

北平獨立評論自第八十期刊蔣廷黻先生發表革命與專制一文之後，接着便有胡適之與吳景超兩先生的論文，繼續討論這個極根本的建國問題。蔣先生在第八十三期又發表一文論專制並答胡適之先生。據蔣先生之意中國最需要的是統一，要達到這個目的，必須專制。這種專制「是個人的大專制」並非現今「數十人的專制」。蔣先生的理由是：

「我們以為個人的專制來統一中國的可能。比任何其他方式的可能性較高。破壞統一的，就是二等軍閥，不是人民，統一的問題就成為取消二等軍閥問題。他們既以握兵柄而割據地方，那末，惟獨更大的武力能打倒他們。中國人的私忠，既過於公忠，以個人為中心比較容易產生大武力。……」

蔣先生認定中國的不統一，固由於軍閥，但因中國人的意態與物質狀況容易產生軍閥，故「以為唯一的過渡方法是個人專制。」

胡適之先生則以為建國的必要階段不必專制；因為統一政權，固然是建國的條件，但政權統一不必就是專制。胡先反對以專制為建國的理由是：

第一，因為中國現今沒有能專制的人。

第二，中國現今沒有「大魔力的活問題，可以號召全國人的情緒與理智，使全國能站在黨領袖或某黨某階級領導之下，造成一個新式專制的局面。

第三，胡先生以爲民主政治「只是一種幼稚的政治制度，最適合於訓練一個缺乏政治經驗的民族。」所以他主張「在我們這樣缺乏人材的國家，最好的政治訓練，是一種可以逐漸推廣政權的民主憲政。中國的阿斗，固然應該受訓練，中國的諸葛亮也應該多受一點訓練。而我們看看世界政治制度只有民主憲政是比幼稚的政治學校，最適宜於收容我們這種阿斗。我們小心翼翼的經過三五十年的民主憲政的訓練之後，將來也許可以發憤實行一種開明專制的機會。」

胡先生所舉出三個理由，明明告訴我們：（一）現在中國不但沒有能專制的人，而且沒有大魔力的活問題，可以造成新專制的局面，如果有的話，胡先生好像也贊成專制。（二）經過了三五十年民主憲政之後，胡先生更贊成實行一種開明專制。

吳景超先生則根據歷史的例證，以爲現今中國，「還未跳出革命的第二時期。」（第一期自苛政至現狀推翻，可以稱爲打倒舊政權時期，又可稱爲革命第一期。第二期自羣雄爭權至統一完成，可以稱爲創立新政權時期，又可稱爲革命第二期。第三期自善政至和平恢復可以稱爲建國時期，又可稱爲革命第三期。）「羣雄割據時期無論久暫，總要演化到統一的途

徑上去，而在中國歷史上幾沒有例外，統一是以武力完成的。」所以「羣雄割據時期內除却武力統一的方式外，我們看不出還有什麼別的方式可以完成統一的使命。」因此吳先生不贊成以開放政權，或聯邦自治，或建設方案來完成統一。換言之，所謂建國，所謂統一，只有武力便成。

這樣看來，蔣、胡、吳三位所討論的只是建國問題或政權統一問題不過各人的方式不同而已。據我看來蔣吳兩位的主張是很接近的，因為蔣先生之所謂「專制」與吳先生之所謂「武力」在性質上是相同的。蔣先生對於個人的專制有這樣的說明：「……唯獨更大的武力能打倒他們。（指二等軍閥）……以個人為中心比較容易產生大武力。」我們於此，可知蔣先生所謂專制，實不是開明專制，更不是現今歐洲所流行的獨裁政治。所以我們只覺得蔣吳兩位都一樣抱着以武力求統一的主張。胡先生則主張民主憲政；開明專制須在民主憲政行了三十年之後，纔有機會。

但是如果中國現今有能專制的人並有造成專制的大魔力的活問題，似乎也贊成專制。不過胡先生之所謂專制，與蔣先生的是不同性質的。結果三位討論，只有兩種主張：就是專制或武力與民主憲政。

我把三位的主張分析之後，現在先加以批評，然後再將我的意見寫出，藉資商榷。

第一，我以為蔣先生的個人專制，與吳先生的武力，在建國方面，都是走不通的路。我認政治是實際的是隨着環境的。我們不必管法國二百年波奔朝專制如何，或者，俄國三百年羅曼羅夫朝專制如何，雖西洋的史實可以做我們建國事業的參考。我們也不必問秦的武力如何，漢的武力如何，因為歷史的歷程未必定會重現的。我們應該注意排在我們眼前的現象。我反對以專制或武力求統一的理由，有如下述：

(一) 我認武力或以更大的武力打倒小武力是一種得不償失的方法。中國現今的割據局面誠在蔣先生所說，一半由人民的意態，一半由於物質的狀況。既是這樣，單單用武力，豈能奏效？人民意態的更變，須靠政治教育；物質狀況的改善須靠建設。這兩種——教育與建設——實非戎馬倥傯時期所能辦得到的。那末，武力縱獲得暫時的成功，而終非根本的解決。恐怕為時未久，而羣雄割據的局面，又要重演了。而且利用武力的事例，自辛亥革命以後，甚至國民革命以後，由袁世凱，吳佩孚，至蔣介石都排在我們眼前；但是中國何嘗有統一？民國十九年蔣馮中原之戰，結果蔣勝，這難道不算是以更大的武力，打倒小武力嗎？但是「統

「一」在那裏？最近如察哈爾的事變，福州的反叛，也都一齊打倒了；但是我們所冀求的統一；到底實現沒有。我更以為我們一談武力，就離不開內戰；一說內戰；就免不了破壞。同時一有了內戰也就免不了外交的麻煩。我更能證明沒有一次內戰，沒有不被外人利用來作侵略的工具。」（用蔣先生的話。）所以在現今欲求統一，實在不敢再用武力，因為在我們這個國家，武力是宗「敗家滅國的奢侈品」。

（二）我以為利用武力或個人專制，也絕不能啓發人民的忠心，且容易引起社會總崩潰。蔣先生相信中國人的私忠過於公忠，故「以個人為中心，比較容易產主大武力。」其實蔣先生錯了。這因為蔣先生未想到忠所以發生的原因。我們都知道現今農村破產，民不聊生，是一種千真萬真的事實。在這時假使有一個救民於水火的「真命天子」出來，也許能得一般人民的擁護與崇拜。若使專利用武力的話，那就適得其反。因為要有更大的武力，必須有更多的軍隊，更須有更多的軍費。于是不免財政困難，剝削更甚；剝削愈甚則政愈難。而且用武力的時候，軍隊對於地方騷擾，人力物力的徵發在在都足以構成「如水益深，如火益熱」的情況。是則，人民未見武力的好處，必先感受的痛苦。在痛苦之下，而謂人民能表示忠心，我實在不敢相信。如果利用武力，至於極端，我敢說，不但國家財政臨於絕境，社會秩序，不易維持，而且還怕一般民衆更容易「挺而走險。」到那時，恐怕武力隨着社會總崩潰而

同歸於盡了。

(三) 我以為中國現今不但沒有能專制的人，而且也沒有能服從專制的人。正如吳先生所說：「因為參加推翻政權的人，各人都有野心，誰都願意做領袖，誰也不甘居人下，所以在野心與野心相衝突的時候，自然革命的勢力便分裂了。」唯其如是，我認個人專制與武力，在現在中國是走不通的。退一步說，假使中國現在有一個能專制的人，若沒有一般人真心服從他，做他耳目，他也不能有所作為。做領袖者雖能「推赤心，置人腹中，」無奈一般人多是攀龍附鳳的，待到毛羽豐滿，就要高飛了。這豈但個人專制不易產生，就是民主國的政黨領袖，也不易於養成。所以我認一國之內，如沒有能服從領袖的人，便不能產生偉大的領袖，何況能用武力做到個人專制的大人物。中國現今所患在領袖太多，而真正能服從領袖者，一個也沒有；所以也就沒有真正偉大的領袖。中國既沒有這個領袖，個人專制如何可能呢？

此外，我還認個人大專制與武力，乃是背時代，逆人心的方法。我們只看二十二年來，每次內戰，所謂二等軍閥相勾結以推倒頭等軍閥，差不多都利用人民厭棄武力專制的心理來相號召，就能明白人民意志的向背。到如今，什麼好名詞，好標語都被利用完了，而人民在多年壓迫之下也漸漸醒了。所以現今人民對於一切武力，不論大武力或者小武力，都是想排

斥，極端厭惡。武力既未能取得人民的信心，又未能擔保人民的福利，蔣吳兩位以爲全憑個人專制或武力的可以統一中國，那真是在做夢。

#### 四，

第二，我贊同胡適之先生所主張的民主憲政，但我不十分相信民主憲政乃是最幼稚的政治制度。民主政治固然「給予多數平庸的人有個參加政治的機會，可以訓練他們愛護自己的權利，」但我們要留意別讓這最幼稚的民主政治，變成暴民政治。我對於民主政治的意見是這樣：國家大事固然要取決於民衆，然而這般民衆乃是智識分子，而不是器量狹小，而又下愚的。民主社會裡，固然不必有特出的英才，然而最有才能的人須放在最適宜的地位。再者，民主政治之下，社會的原則是平等與自由，各人雖有職務的不同，但沒有階級的差別。在民主社會裏，人民智識大約都是平均的發展，而不是畸形的偏在，所以在表面看來，民主政治就好像是最幼稚的政治制度了。民主政治一方面，固然可以訓練民衆，但另一方面，有相當訓練的民衆也是民主政治所以成功的最必要的條件。

中國教育之不普及，與民衆之缺乏訓練，是無可諱言的，而且現今社會問題之繁多，與乎社會和平之亟須維持，也構成了緊張的非常的局面，所以我以爲僅僅實行民主政治是不夠



的：萬一弄不好，還怕生出流弊來。因為（一）在民主政治之下，民選的國會雖能使全國政治的向心力加強。但是國會內以素乏政治經驗的代表相聚一堂，『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結果必使政治的進行遇了莫大的阻礙；因之，政治的責任，與政治之效率都等於零。而且從容議政也不是現在非常的局面所需要的。（二）再者，在中國說起民主政治，自然指代議制度。在百年前——英國維多利亞時代——我們也許可以說代議政治是民衆教育的利器，因為當時政府管理的範圍很狹小，一切政策大半不是專門性質的。到了現在國家所管理的事務日益繁多，所引起的問題也日益複雜，政治的權力差不多由立法機關，移到了行政機關；同時國會無形中便成爲行政機關的登記處。而且國會法律案的性質也漸趨於技術化，其意義多爲民衆所不易明白的；立法的範圍也極廣大，其主要的原則，也非民衆以有限的時間去討論所能了解的。

根據上述兩種理由，我認爲僅僅民主憲政於國家未必有很大的補益。我的意見以爲民主政治是一個建國的常軌，是一種國家根本的組織，其目的，是要自由，二，是要平等。這是一種合時代的，順人情的建國的基础，而且是永久的基础。但是光埋下了基础是不够的，所以我們對於具體的政治方式，不能不作相當的考慮。所謂具體政治方式乃指政治的實際運行而言。換言之，即是在常態之下，我們不妨採取從容議政的方式，藉以訓練民衆。在變態

之下，我們應該取斷然處置的方式，藉以貫徹政策，但仍無背於自由與平等的原則。

## 五

這樣的政治制度當然不是十足的歐美式的民主政治，而是民主獨裁制，或者可以說是國家的民主制。我以為民主與獨裁不是根本上不能並立的，亦正如社會主義與民主政治不是相衝突的。民主政治在中國現今情況之下，可視為國家的基本組織，而政權的行使不妨有其他的方式。不過行使政權者須注意人民的意向，同時須受人民的監督而已。這種獨裁制是建設在胡先生所主張的民主憲政之上，與蔣先生的個人大專制是絕不相同的。這種方法我認為：一則可以伸數年來一般人的憤懣使奸黠者無所藉口，去幹翻政府的勾當，而訓練民衆的政治經驗還是餘事；一則可以使政權漸歸於統一，並徐徐的演化出一個大而組織的、而且鞏固的政治的與經濟的制度。總而言之，現在中國最重大而且最主要的問題，不是誰應統治這個國家，而是應如何先建立一個像樣的國家。民主獨裁制就是建立一個像樣國家的途徑。其他國家因歷史有相當的繼承建國甚易。如法國革命所繼承的有道路與集權制的官僚政治；俄國此次革命所繼承的有鐵路與警察制度。我們中國疆域太大，交通不便，教育幼稚，凡可以作為建國之用的物質的與心理的基礎，毫不存在，自然在中國建國的事業比較其他國家困難得

多。所以我主張中國政府在行政方面必須是獨裁，而後纔能創立一個有效的行政制度，纔能貫徹一切計劃而樹立現代國家的規模；同時我又以為這種獨裁必須建築在民意之上。唯其如是，政府因有人民的監督，始能給予人民實質的利益，而不至濫用權力以營私。另一方面，人民對政府必漸漸生了普遍的信仰。這樣的政府纔能直接與民衆生活相接觸，使民衆不以政府當做抽象的東西，而且會自然而然的擁護政府，增加了政府的威勢。

我這裏所謂民主獨裁制，與蘇聯的一階級獨裁，或者意大利的法法西斯一黨獨裁，都不相同，我之所謂獨裁是以民主政治為基礎的獨裁，這在上文已經說得很明白。各種制度都是時代性的。也都是隨着環境變動的。現今所謂民主政治其性質已經與百年前民主政治的性質迥不相同。我們不必因為歐戰後各國所實行的民主政治好像都有衰頹的傾向，便把民主政治看做不順眼的東西；我們也不必因獨裁政治風起雲湧，便加以無上的崇拜。我總相信將來在社會主義之下，民主政治仍是很好的制度。這因為民主政治可隨時代的環境而演變，且有其自身的價值。現今我們所看見民主政治的毛病，乃是枝節問題，與這制度的根本並不相涉。所謂民主政治根本乃是自由與平等。而自由與平等係人類所普遍冀求的，也就是人之所以為人的必要條件。我主張民主政治做建國的根本，着眼處即在此。至於這種制度之其他設施，我們不必都學步歐美，我們應該根據歷史的背境，定物質的現狀，以及教育的程度而另有所

改造。這就是所謂民主政治的枝節問題。例如選舉制度，立法機關的組織與權限，政黨輪流執政，三權分立，諸如此類的問題。至我所謂獨裁制不是一個人的，更不是一階級的；前者有人亡政息的危險，而且也沒有這種人；後者乃是生吞活剝的辦法，況且在中國根本上就沒有什麼無產與有產的階級。一黨獨裁是不成問題的；因為歐美民主國家，實際上也都是黨治。有人以為意大利是一黨獨裁；在我看來，其實，只是墨索里尼一個人的獨裁。在民主獨裁制之下，如果一黨真有主義，有組織，有計劃，並有實現計劃的力量，我也不反對一黨獨裁。但是這種獨裁是有時間的限制與範圍的限制的。

簡言之，我所主張的民主獨裁制，一方面是要保障人民的自由；一方面也要顧到國家的權力；前者除給予人民自由外，在現狀之下，最大用處，就是杜絕一般野心家的口實，免得他們借救國救民的好名有所企圖；後者乃是一種較經濟的，較敏捷的方法使一盤散沙的，經濟落後的國家，容易漸趨於現代化。

上文所言，只是一種普遍的原則，至於在這種民主獨裁制之下，政黨應該怎樣，政府的組織應該怎樣，人民應該怎樣監督政府，政府應該怎樣行使權力，我另有具體的計劃與說明，以補此篇的不足。

最後我以為這是「心所謂危，不安緘默」的主張，也許值得讀者的注意與討論。

二十二年，一月，十四日。

# 社會問題之解決的社會哲學基礎

朱亦松

任何一種社會必有一種主義或數種主義，統制着它的生命。而任何一種主義詳細說來都是一種社會哲學，都有它的倫理基礎。至於其倫理基礎是否健全，自屬別一問題。本文所置重之點，即在於根據民主主義的倫理，討論社會問題，而謀求其解決，假如有人認為社會學家企圖解決社會問題不應當存着一種倫理的眼光或社會價值 Social Value 的眼光，那就未免錯誤了。當一位社會學家研究社會現象的時候，他必不可挾持成見，懷有善惡觀念，而任意剪裁事實，以致失其真相。這是對的。他必不可否認事實，或甚言之，或輕視之。他必須客觀地研究各種事實之發生的原因，其影響所及暨其所臻程度，乃至一絲一毫都不可苟且，這也是對的。但這祇是在他研究問題時期中所抱之態度罷了。可是當他達到了結論和決定解決問題的時候，他便不得受一種倫理哲學或社會價值哲學或社會哲學的支配了。因為我們必須問道「我們為什麼要這樣的解決一個社會問題，或種種社會問題呢？我們是不是希望要實現一個較好的社會。和在這社會裏面，各種社會問題都護得較美滿的解決呢？這社會是不是我們心目中的理想社會呢？換一句話說，便是我們要問我們的社會目的何在罷了？這個問題確實是一個必不可避免的問題。我不妨加重的說，它便是一個倫理哲學的問題或社會價值

哲學的問題。此問題或徑直稱之爲社會哲學的問題亦可。我認爲一種健全的社會哲學或社會價值哲學或倫理哲學若能深入於一般社會領袖之意識域中，則對於社會問題之美滿的解決，其關係非常重要和密切。蓋此等健全的社會哲學不但應當爲一般社會學家所接受，而且一般學者及社會工作家都應當接受之。因爲唯有一個社會發達了這樣社會意識，然後它方能活潑。地。有。生。氣。有。熱。情。的。精。神，和。有。創。造。力。一。切。社。會。改。革。之。嘗。試。方。可。期。其。產。生。偉。大。的。效。果。西。洋。許。多。國。家。如。美。如。英。如。法。號。稱。如。民。治。主。義。的。國。家，按其實際，它們並未嘗有一種健全的社會哲學，支配它們的統治階級之意識，不特如此，它們並且有數種和民主主義相反的主義支配了它們的意識。其結果它們的政治方面工商業方面，宗教方面，家庭方面甚至於藝術方面，便產生了種種嚴重問題。它們的社會裏面在在都表現出仇恨，猜疑，欺詐，貪婪，物質滿足的追求和弱肉強食的現象。一言以蔽之，這些皆是赤裸裸的和粗惡的唯我主義的現象罷了。我們若根究其社會問題癥結之所在，則不外確實由於缺乏一種健全的社會價值哲學或倫理哲學之所致。現在一個當前的中國最嚴重問題，便是樹立一個新社會哲學暨其權威的問題。我認爲這個問題若不能得到解決即使我們能以完成了種種物質的建設諸般社會問題仍是無從解決。這社會仍然是一個基礎杌隉的社會。譬如建層樓大廈於散沙之上，卒不免有時時傾塌的危險。因爲從最好方面說，物質財富的鉅大產量祇可視爲滿足慾望的工具而社會問題之解

決的涵義，蓋不僅僅一個企圖物質財富之比較的分配和人人獲得物質慾望的滿足問題。其核心乃在於人們關係之如何調整。換一句話說。社會問題便是一個人類如何共同生活的問題罷了。人人都是目的，罔有例外。各個人格都應當獲得合理的和充分的發展。人們關係必須建築在這樣的信仰上面。任何社會制度之保存，革正和創造，都應當根據這樣社會價值哲學，爲其保存，革正，創造的張本。現在我們且於下面略述西洋社會問題之癥結所在，然後我們便可知道樹立一個新社會哲學暨其權威的重要了。我們也便可知道中國今日確有建立一個健全的新社會的需要了。

在歐洲大戰以前，很有許多西洋人充滿了樂觀精神和抱着進步的信仰。在大戰以後，這樣的精神和信仰都受了絕大的打擊。恐怖和悲觀瀰漫了他們的世界。他們都能認識他們的文明，根本缺乏牢固性。其基礎極爲脆弱。國際秩序和國內秩序都非常的動搖。一般民衆都騷然不安。革命的空氣到處極爲濃厚。不但在俄羅斯是這樣情形，便是在其他歐洲大國家也是這樣情形。待權階級之盲目自私，和一些普羅階級領袖之狂熱的過激化，徒使階級的仇恨愈深，和事態愈益惡劣。一切恢復好感和諧和的努力，均變爲不可能。我們認爲毒害今日西洋文明和造成其種種社會問題的勢力自其大概言之不外（一）黷武主義（二）國族的帝國主義（三）商業主義（四）物質主義（五）唯我主義（六）資本主義（七）階階衝突主義等等

這些勢力自十九世紀以來便構成了西洋社會哲學的質素。它都構成了一種唯我的暨物質主義的社會哲學所謂西洋文明便建築在這樣社會哲學的基礎上面最近五六十年以來西洋各國的內政，外交，商業和倫理無一處不受着這樣社會哲學的支配而且日益變本加厲民主主義何嘗有力的支配着西洋人的生活？於是它們造成了許多嚴重社會問題直至今日，這些問題尚無美滿解決的希望。國際衝突和國內衝突，乃是從此等社會哲學自然產生出來的結果。固然有人認爲生物和經濟的條件爲構成社會問題之最後的和客觀的原因，然而此不過係從一方面看法。它們殊不足以盡社會問題之意義的底蘊。從他方面看法，種種嚴重社會問題的發生。實由於人們缺乏一種健全的社會哲學爲其行爲的導率標準之所致。

於是許多不良的民習便因此產生出來。在十九世紀，在西洋社會裏面，開始了專制主義和民主主義的衝突。此衝突亦即是野蠻和文明的衝突；暴力和博愛的衝突，十九世紀因爲沒有適當的社會知識和適當的社會價值理想，結果遂不會能够消滅這些衝突。而西洋社會裏面的一切其他衝突，顯然都是社會裏面發生了作用，於是更生產了許多新問題。此等勢力例如人口的增加，知識的激進，種族和文化的混合，國際關係之日益密切，新機器的創造，工商業和政治方面的發展，以及宗教的衰落等等都是。

我們如要對於西洋社會問題得到一個真正的綜合觀點，則必須考慮一切這些形成西洋人



們生活的因素，無論這些因素是物質的或非物質的。因為社會問題的解決乃是一個調整社會生活的一切因素的問題。我們爲要達到這個目的起見，便非得超越一切狹隘和偏頗的見解。我們必要避免一切片面的社會。改造綱領對西洋社會問題如此看法對中國社會問題亦如此看法。例如有人認爲人口問題乃是一切社會問題之關鍵，如果我們解決了人口問題一切社會問題，好像便都不成其爲問題。其次也有許多人。認爲所謂現代社會問題便是勞動問題。我們所要解決的便是一個適當的生產和適當的財富分配問題。

復次許多淑種學者則認爲遺傳統制問題乃是唯一的社會問題。如果我們對於出生的人類都能保證其合乎優良人性標準，則一切其他社會問題都自然而然的消滅。

又其次女權運動者認爲如果婦女有了充分自由權利，社會即解決了它的最大問題。

最後，許多道德家和宗教家則認爲道德的墮落和宗教的信仰的薄弱乃是造成今日社會問題的主要原因。所以我們非得提倡道德和恢復宗教信仰不可。

以上這些觀點雖然各有相當理由但各個都十分重視其特殊因素，未免失之過做罷了。這些因素的確都是應當重視的。它們之未能獲得調整和革正的，確都是造或諸般社會問題的條件。它們各個自身都構成了社會問題。然而我們也必須知道社會問題之綜合的究竟的意義，乃是一個人們如何共同生活的問題。它是一個人們間的相互關係問題，自其精神意義上說它

便是一個企圖社會公道之實現的問題。我們從此點看去便可以確實知道建立一個健全的社會哲學暨其權威對於擾起社會意識和發動社會情緒，以促進社會問題之解決的重要了。惟有在社會自覺的意識擾起以後，和其高貴的情緒發動以後，一切良好的改造社會計畫方能有效的推行無阻，而獲得民衆之同情的擁護。否則優生學者縱然日日高喊遺傳統制有何用處？社會領袖縱然日日大呼產業社會化，有何效果？女權運動者縱然日日渴望給予女子以充分自由權，有何辦法？煩憂人口過剩者縱然日日宣傳人口過剩，又有何益處？

人們樹立了一種健全的社會哲學以後，然後社會方能實現其統一性和諧合性。吾人對於從此等源泉——如腐化的物質主義，粗陋的唯我主義，猙獰的黷武主義，詭觀的商業化主義以及空虛的和頹廢的人生觀等等——所產生出來的種種惡劣民習暨制度有調整革正和廢除的根據。吾人對於什麼新的制度和民風民習應當創造出來方有正確主張的根據。無疑的在一個社會面臨一種新社會哲學的創造。暨其權威的樹立，乃是解決諸般社會問題之基本的條件。它也是人類文化問題的核心。

我們如果希望社會從此不再陷入盲目演進的錯誤，或毫無計劃和聽其自然的發展，則必需要樹立一種健全的和有權威的社會哲學，以爲實施社會政策和解決社會問題之南針。

# 論民主

吳惟平

若在一個合理的社會裏面，政治問題該是經濟問題的一部份，撇開經濟而單言政治，好比隔靴抓癢，是不會抓着癢處的。但是現在，政治問題還是儼然的獨立着，還可以把牠單獨拿來研究。

現在政治問題中最大的問題，莫過於國家的主權問題。這主權問題中又有兩個大問題：一個是主權的所屬，一個是主權的運用。今請先就主權的所屬言之。

國家主權該是屬於什麼人的呢？自古至今，共有六種說法，形成六種政治，就是：

- 一、屬於神，即神權政治。
- 二、屬於君，即君主專制。
- 三、屬於一黨，即一黨專政。
- 四、屬於一階級，即階級專政。
- 五、屬於一領袖，即領袖獨裁。
- 六、屬於國民全體，即民主政治。

這六種政治，各各都有不同的意義。但最大的不同，就是民主和反民主的不同。其中第

六種就是民主，其餘五種都是反民主。不過神權政治和君主專制這兩種，現在除了少數未開化的民族還在有形無形中依舊實行外，其在一般的文明國家，早已成爲歷史上的名詞，沒有資格同民主成爲對立的了。英意日本等國雖然還有國王和天皇之類的名目存在着，而國王和天皇的實質早已取消。所以現在事實上同民主對立的，只有一黨專政、階級專政和領袖獨裁這三種。分別研究如下：

一黨專政就是一個政黨或革命黨獨攬國家的政權，既不容許人民有平等的政治地位，更不容許異己的政黨存在。這樣的一黨專政，最好的例莫過於中國。他們之所以主張這種專政，唯一的理由是說國民的程度太低，非先加以教訓，不足以實行民主。因而有所謂訓政。關於訓政這件事，國人中已經有過激烈的論爭。把論爭的結果歸納起來，贊成訓政的人，差不多說來說去總不出是國民程度太低一句老話。至於反對訓政的人，理由就很多了。舉其大者，約有四種：第一、所謂教訓，含有重大侮辱人民的意味。第二、同是同等程度的國民，這個要教訓那個，於情理既不通，於事實亦不合。第三、民主政治的智識和經驗，只有在實踐中可以得到。所以縱使人民程度太低，也惟有迅速使人民得到實踐的機會，斷斷乎沒有不使人民參政而能望其提高參政的智識和程度者。關於這一點，有人作過訓政等於閨女未出關先學養孩子的比喻。可謂恰到好處。第四、訓政有很多很大的流弊，最近幾年來的事實，就是

證據。這都是關於理由方面的話，我個人不願參加意見。不過有一點很奇怪：差不多凡屬黨內的人，都贊成訓政，凡屬黨外的人，全不贊成。單從這一點上看去，所謂訓政。不問牠有無正當的理由，都可以說是一相情願的做法。

階級專政就是一個階級獨攬國家的政權，也是既不容許人民有平等的政治的地位，更不容許異己的政黨存在。這樣的階級專政，最好而且唯一的例，就是蘇聯。蘇聯的專政雖然也是由一個黨表現出來，但與中國的一黨專政比較，有兩點顯然的不同：第一、蘇聯的共產黨是建立在一個階級之上的，中國的國民黨是包括全民的；第二、蘇聯的共產黨同時實行政治和經濟兩方面的革命，中國的國民黨只在政治方面實行革命，而在經濟方面則主張漸進的改良，換言之，即不主張經濟的革命。因為有這兩點的不同，所以彼此專政的意義或彼此主張專政的理由，互有分別。蘇聯專政的理由並不是以為人民程度太低，而是以為過去是資產階級壓迫無產階級，現在無產階級得到政權，要根本消滅資產階級，當然不讓資產階級參予政權。這是硬把另一階級的人，不問他是好的還是壞的，統統降到水平線以下，不以人民看待他們。依我的意思，假如是這麼一回事；社會經濟生活的進程確已走到劃期的時代，一般人民的生活，需要由舊的形態突變為一種新的形態，這時候，有一個包含着整個的經濟政策或社會政策而且確實能夠代表新時代的主義，一旦得到政權之後，爲了完成這種經濟生活的大

轉變起見，不得不以此一主義爲中心，對於一部份明知其有相當時間不慣於此種新生活的人，暫時停止其公權，以防反動，待到全體人民對於新生活有相當的認識，無人敵視這種新生活，而且把全體人民的經濟地位和基本智識都促成在一條平線上，人民相互間並無優勢和劣勢的差別，然後使全體人民同時得到同等的參政權，以實現真正的民主，這樣，我以爲倒可以承認牠也有相當的理由。因爲一般人民的經濟生活如果真由舊的形態突變爲一種新的形態，那末一定有一部份人不慣甚而敵視這種新生活，至少是在舊生活形態中常佔優勢的人多數是如此。此種不慣和敵視，若不加以防範，小則必至破壞社會的秩序，大則能使新社會根本無由產生。但若加以防範，他們也只是一短時間內的不自然，過後就不會感到什麼了不得。比如民國初年的割辮，辮子生在各人頭上，主權當然屬於各人自己，但適應於社會某種的需要，不能不強制人人割下辮子，當那割辮之初，很多人不願意，而且覺得是一種壓迫，可是不久不但不覺得是壓迫，而且反覺得輕快了許多。那種意義的專政和這種強制割辮，就侵犯主權的意義上講，沒有多大不同。自然，那種專政並不是階級專政，因爲歡迎新社會的，決不止是一個階級，即敵對的階級裏面亦未必沒有歡迎新社會的人，正不必一筆抹煞別個階級的全體，顯出自個階級的強蠻和無理。那種專政又不是一黨專政，因爲黨是常常有的，如果凡黨皆可專政，則社會永無民主之日，並且一個普通的黨，換言之，一個承襲社會舊制度，

並無完成社會組織大變動之意義的政黨，無論如何不會找得專政的理由。總之，那種專政，是社會進程中劃期時代的一種非常的「時代專政」或「非常專政」，而且還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其實，共產主義最吃虧的還在「階級專政」的一個名詞上，事實上共產黨掌握大權人，有幾個是無產階級？不仍是包括着各階級的人物嗎？別的不用說，他們的鼻祖馬克斯和恩格斯二人，馬克斯就是小資產階級，恩格斯就是大資產階級。明乎此，便知階級專政云云，也是於情理既不通，於事實亦不合。

不過上述的一黨專政和階級專政，都自己承認是一種過渡的辦法，他們不但沒有否認民主，而且都主張民主，不過各想借此一時的專政為手段，以求達到永久民主的目的而已。所以這兩種專政，都還不能說是民主主義的死對頭。民主主義真正的死對頭，還是所謂領袖獨裁的那傢伙。

領袖獨裁是法西斯主義的主張。法西斯主義起自意大利，不數年間便傳染到了大半個歐洲。現在德國也名實相符的陷入在法西斯的支配之下，東方也有許多國家正在猛烈的進行中。所以領袖獨裁的政治，正在神密的而又瘋狂似的發展着，大有壓倒一切的氣概。我們不言民主則已，欲言民主，對於這種不同尋常的驚人的事態，是不能不用一百二十分的注意力來注意牠，認識牠。

這種領袖獨裁，就施政的方式上講，與從前的君主專制唯一的不同之點，即君主專制有世襲，領袖獨裁不世襲。所以領袖獨裁不論與一黨專政抑與階級專政，都有顯然的不同。此種不同，要點有三：第一、一黨專政和階級專政，都只是一時的專政，過後仍主張民主；領袖獨裁則不然，牠是根本否認民主，主張永久的獨裁。第二、一黨專政和階級專政，都只是對黨外的不民主，對黨內是民主的；領袖獨裁又不然，牠是對黨外既不民主，對黨內亦不民主。第三、一黨專政和階級專政，都有一種預示的整個的主義和政綱，詳言之，都有一種預先宣佈的整個的社會思想和社會政策，使人民能夠預先知道牠施政的動向和標準；領袖獨裁又不然，牠沒有預示的整個的主義和政綱，一切社會政策或國家政策，全視領袖的態度如何而定，那領袖的態度又是「昨日所主張的事情，今天可以毫不猶豫的將牠根本毀棄掉」，所以人民無從預知那領袖施政的動向和標準，只好不識不知，順帝之則。

他們爲什麼要這種做法呢？依他們的說法，最基本的理由有兩個：以爲民主主義乃是多數制，而人民中的多數都是愚民。故民主政治就是愚民政治。國家的福利不是這種愚民政治所能够的保障的，翻過來，要保障國家的福利，惟有賴諸人民中少數智識程度較高的優秀分子。這是一個理由。又以爲多數人民總是各以自己的利益爲本位而互相對立，甚而互相爭持，故必須有一特別賢明的領袖，立在超乎個人利益的整個國家的利益上，以大公無私的精神



來爲公道的主宰。這是另一個理由。此外還有其他次要的理由留待下面再說，這裡先把這兩個基本理由仔細考察一下。

誠然，現在人民的多數，都是愚民。然而，人民中之有愚民，這是天生的？還是人爲的？換言之，這是固定不移的？還是可以轉變的？若說愚民是天生的，是固定的，那我只好閉口無言，否則惟有設法增進人民的智識，使愚民不成其爲愚民，才是辦法。須知愚民只有在專制和壓迫之下才會降爲愚民，故愚民愈多，而需要民主亦愈迫切，豈容顛倒是非，反以愚民爲理由而否認民主？並且民主政治，只是人民公舉代表處理國家的政務，並非國家的政務一件件取決于全體的人民。國家政務究應如何處理，固非愚民所能盡知，然處理政務的結果，其好與壞，直接影響于人民，好則人民幸福增進，壞則人民痛苦增加，愚民愚則愚矣，然決不至並此自身的幸福與痛苦亦竟不能辨識。既能辨識自身的幸福與痛苦，則對給予人民以幸福者，必共起而公舉之，給予人民以痛苦者，必共起而排斥之，乃是自然的結果。這樣，民主主義的精神便巍然存在，民主主義的效果便脫然而出。欲使國家福利得所保障，固然有賴乎少數優秀分子的努力，然此與民主並不衝突。民主的人民不自己直接執政，而必訴之于公舉代表，此公舉，即含有公舉優秀分子之意，其理甚明。試問優秀分子不經人民的公舉或公認，究何所據而能行使國家的權力？

其次，現在多數人民誠然是各以自己的利益爲本位而互相對立，甚而互相爭持，假如真有一個大公無私的人來爲公道的主宰，誰不願意？然此大公無私的人，若不經由人民的公舉或公認，究竟是怎樣來的？誰能保證他的大公而無私？如果說，須看誰有最大的勢力，誰在事實上握得最大的權柄，誰便足以主持公道，那末過去一切貪君暴主，都是最有勢力最握大權的人何以不能真爲公道的主宰？反而爲人民所痛恨？終而爲人民所推翻？又如果說，須看誰在事實上最能大公而無私的誰便足以主宰一切，那末這事實不由人民來公斷，究竟又依什麼爲標準？誰來確定他的真能大公而無私？老實說，政治上的這個「人」的問題，最重要的就是一個來歷的問題，也就是一個手續的問題。掌握政權者要是來歷分明，手續完備，人民便沒有什麼可說，自然今後信任他。反之，如果來歷不明，手續不備，而欲人民信任，那除非是超人。蜜蜂有一種神密的而又自然的蜂王，難道人類也有一個神密而又自然的人王嗎？迷信時代愚民的思想中，或許真有這種人王存在着，然而現在早同神怪之無形消滅一樣的不復存在于天地之間了。總之，需要大公無私的人主持公道，這件事，也並不與民主衝突。民主主義也是同樣的希望能有此等人物，不過民主主義所希望者，乃係選舉而出的代表，並非那種來歷不明的超人而已。

所以這兩種理由，都是矯揉造作的理由，不能動搖民主的原則。當然，凡是一種制度，

都有牠的優點和劣點，民主政治也是一樣的。然而兩相比較，獨裁政治的劣點實在是太多了。信手拈來，便有這種種：獨裁的領袖既然來歷不明，無論如何不能取得人民長期的信任，此其一。領袖健康有限，一旦死亡或殘廢，後繼茫茫，此其二。世無萬能之人，一人終難駕御一切，此其三。個人思想必有所偏，事事憑諸一人之好惡，難免流為專制和暴虐此其四。人人皆知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斷非個人所得而私，此其五。政權得為個人所獨攬，勢難避兔野心家之竊據，此其六。政權果為野心家所竊據，革命必可拭目而待之，此其七。諸如此類，述不勝述。這些都是獨裁政治不可救藥的大缺點，同時也都是非行民主不可的大理由。

然而獨裁政治這名詞，現在不但有許多人聽後不覺得怎麼的不順耳，而且還有一部份人真心誠意的歡迎牠，這究竟是什麼緣故呢？原來自從十八世紀以來，民主政治所表現在大眾面前的，確有許多很大的弊病。對於這樣弊病。我們不但無須掩飾牠，而且正要盡情的把牠揭出來。弊病為何？舉其大者，約有三種：

第一、現在一般的民主政治，都是一種選舉代表的方式。那些被選的代表，在那選舉的時候，無不甘言蜜語以求得人民的歡心，一到獲選之後，却事事憑諸個人的利害為捨取，心目中不復有人民存在着，甚而賄賂公行，醜態百出，相去人民的意志，不知幾千萬里。如此民主，不啻僅為官僚政客另開方便之門，于國何益？于民何利？

第二、現在一般的民主政治，都是政黨政治。議會中政黨林立，議員各有黨籍。政黨的最大目的在於爭取政權，於如何報効國家一事，反在其次。議員的最大義務在於遵守黨規，對於如何報答人民一事，又在其次。各個政黨乃至各個議員，無不枉盡縱橫捭闔之能事，互相傾軋，互相鬥爭。所以議會開會，不是議員的會議，而是政黨的混戰。在那混戰當中，各人爲了黨的利益，不惜公然犧牲國家的利益，乃是常見的事情。如此民主，豈人民之福利

第三、現在一般的民主政治，都是某種合議制和平衡制。那種合議和平衡，各黨各派在其互相爭奪權利的時候，確有多少方便，但若到了處理國家的大事，那末，一機關內既衆議紛紜，莫衷一是，各機關間又互相鉗制，誰不依誰，結果，政府機體麻木，施政毫無敏活可言。際此國家多事之時，雖國家集中權力，造成强有力的政府並以敏活的手段應付一切，尙虞不足保國家的安全，又豈此麻木不靈的政治機構所能望其有效？

這些都是盡人而知的事實，同時也都是獨裁主義者所據爲否認民主的理由。人民代表的違反民意，議會政黨的爭權爭利，自然都是人民所厭惡的。行政需要敏活，國家需要强有力的政府，自然也是人民所贊成的。然而這又何損乎民主主義的原則？民主主義的原則上，並無容許人民代表可以違反民意的規定，亦無容許政黨互相對立互相爭奪的一條，更無不許行政敏活，不許政府有力的一回事。那種種弊病，完全出自民主政治的運用上，並非出自民主

政治的原則上，換言之，過去所有種種的弊病，皆因民主政治的運用不得其當，而民主政治的原則，對此實在無須負擔連帶的責任。試問上述各種弊病，究竟有那一種不是可以立在民主的原則上加以有效的糾正？

我們反對一切反乎民主的和專政獨裁，自信一不是意氣用事，二不是沒有忍耐力，實在因為牠是一個切身的利害問題。假如真有一種專政或獨裁，能有一百二十分可靠的保證，保證牠將來必然有利于國，有益于民，那末，以我個人作比喻，莫說暫時剝奪我的公權，我不會不願意，就是拿刀指着我，說要借頭一用，我覺得也未嘗不可以商量。反之，如果所謂專政或獨裁，還只是一種「姑且讓我一試」或「姑且讓他一試」的說法，對於效果並無確實可靠的保障，那末，莫說我不願借頭，就是叫我犧牲一毛一髮，我也覺得十二分的不願意。爲什麼呢？因爲試驗失敗了之後，我所犧牲了的一毛一髮，絕對無處可以要求賠償啊！自然，民主政治也不能寫「包」字，牠的效果也沒有什麼確實可靠的保障；可是，既曰民主，那就人人都是參預政權的一分子，其結果，好與壞都是各人自取的，好了不必說，壞了也沒有什麼可說。好比我自己失足跌了一跤，只好自怪不慎，爬起來撲一撲衣服，撫一撫傷痕，也就算了。然而這一跤，如果是別人不得我的同意，無故把我推倒的，那我怎肯干休呢？不是從此多事了嗎？同是一跤，有此分別，獨裁和民主最大的分界，就在這兒。便因爲這個緣故，

民主主義的原則是顛仆不破的。無論牠過去曾經發生何等不良的現象，我們都只能從那民主主義的運用上去謀補救，斷斷乎不能因噎廢食，對整個的民主發生懷疑。也就因為這個緣故，我們對於民主主義的運用，必須重新加以全盤的審查，重新給以整個的修正，而且急不容緩。至於如何審查，如何修正，那就是本篇首段曾經提及的所謂主權的運用的問題了，這問題內容複雜，且待另作專篇。

一九三四年、一月十五日、于北平。

# 從社會形態的發展方面改造現社會（續）

牟宗三

## 丙 專制主義下的商業資本主義社會

### 一 開端解蔽

1 上段把封建社會的典型發展及崩潰述說了那麼多，目的爲的使人要清楚了解封建社會是有其特性的。在政治經濟文化各方面都有其特殊形態，都是以自成一體時代。並非如王宜昌先生所說中國的封建社會只是政治上的一個空殼，而西洋的封建社會是有經濟關係的。我們認清了這個封建社會爲標準形態，則其他非如此的皆非封建社會。

2 我們普通常說某某封建某某宗法，封建軍閥，封建思想等，其實完全是由一個典型的封建標準形態引申出來的一些望文生義，我們可說全都是那個典型形態的上層建築。如果那個典型形態過去了，而我們還以遺留下的那些封建意識，封建腦袋，封建思想，爲真正的封建社會，倒把那個典型的標準形態丟在腦後，而偏僻地曲解成奴隸社會，試問這是什麼腦袋？真有如李季先生所說的「和封建結不解緣的，並不是中國，而是陶希聖君的腦袋：」不但

是陶希聖君的腦袋，而且是王宜昌，郭沫若以及其他主張封建社會的腦袋，所以我們必須把封建腦袋與封建制度劃分開，我們不能望文生義的胡說，主封建者如此，主奴隸社會者亦復如此，如果不劃分開，像王宜昌那樣的腦袋規定法，則中國數千年的社會不但都可以是奴隸社會，而且都可以是封建社會，而且其他……。

3 復次，我們看社會形態當從其在歷史上有什麼的特徵。有了特徵，我們即以之來標誌這個階段的社會形態。而這個特徵又不是可以憑着你的主觀腦袋隨意去取的，它是由社會發展而轉變來的。歷史的發展逼出這個特徵而為前代所未有，那末，這個特徵即是認識那個社會形態的必具要素。我們指出這個特徵必具要素，並不是說其他性質就不承認了，就沒有有了。乃是說它不是特殊的，不是重要的，不是必具的就是了。如果分期而不找出特徵，則結果等於不分期。譬如將一個人分成胚胎時期，嬰兒時期，青年時期，壯年時期，老年時期，則每一時期必有其特徵。如果捨此特徵而不論，而說壯年或老年時期會吃飯會睡覺，有喜怒哀樂，這種分法結果即是不分。不料現代吹牛的人完全犯了這個毛病，其意見焉得不分歧，焉得不有出入，焉得不各人持之有故言之成理，焉得不各是其所是各非其所非？

4 明白了以上所述的三點，我們就可以來批決謬見。我們反對王宜昌的奴隸社會與封建社會論，也反對郭沫若的奴隸社會與封建社會論，並反對陶希聖李季兩先生的後封建半封建



前資本主義社會論，並也不承認王禮錫的循環論以及胡秋原本列寧的封建專制主義社會。因為他們不是望文主義，即是湊合字眼，或是食古不化。

5 我們再接續着上段末所列的九條性質以觀察當時社會各方面所起的變化，及其與前之差異，將來之新形態。這個時代是轉關時代，我們有重說的必要。

(一) 在政治方面，兼並日盛，政權日日集中。一個方格式的疆疆自保，使日日見少而至於消滅。由萬而至千，由千而至百，由百而至十，最終剩了七國，而結果歸於一統。這在政治制度方面起了多大變化？在這種政治制度變化之下，人民的意識又起了多大的變化？

(二) 經濟關係與形態隨之也複雜起來，改變起來。從前自足經濟，現在成了生產經濟。由生產經濟可以分化出從事生產的經濟方面的階級關係，即有農業與手工業的結合之生產，有獨立生產者即手藝工人之生產，有商人兼工人的生產，有專恃着商品交換而生存的此即所謂商業資本，有專恃着放利而生存的此即所謂高利貸資本。而所以有這樣的分化，有兩個基本形態在那裡限制着，支配着：(1) 農業與手工業的直接結合；(2) 商人兼工人的生產關係。由這兩個基本形態如果遇見了機會或條件或無阻碍，它便慢慢的也可以發展到工業資本主義時代。中國之所以未到資本

主義時代，其原因有二：（一）專制主義的壓抑；（二）大陸地理的自然封鎖。它並不是由於沒有機器，也不是由於商業資本之本性不能到工業資本。

（三）由於生產關係之分化出各種階級，其中就不免有給地主種地的佃戶或農奴，給貴族官僚紳商大賈作支使的丫頭奴僕或奴隸的存在。這類人如果投降了商人，便替商人作工從事生產；如果投降地主，便替地主耕地；如果攬進了貴族官僚紳商大賈中人，便是狗仗人勢的奴才；如果無一而可，便是不務正業的流氓。不要看不起這一類人，他在中國社會裡佔重要的位置，起革命是他們，挺而走險也是他們，搗亂也是他們，倒覆是他們，做皇帝也是他們。這種階級我們姑稱之曰流氓遊離分子。遊離分子與士大夫互相爲用而造成一個連環性，這個連環性我們說他是政治方面的連環。中國的政治，自封建社會崩潰後，完全建基於這個連環之上。但我們不能說自封建而後，有這一類流氓分子，我們就說這是奴隸社會。你只見了他作奴隸，你沒有見過他做皇帝；你只見了他做佃戶，你不知道他還是流氓；即便你知道了他是流氓，你却不知道他是什麼政治制度經濟關係下的產物，你叫這種社會是奴隸社會，你會指出什麼社會形態來？皮毛哉！望文生義哉！你叫周秦兩漢以至五胡十六國都是奴隸社會，你會見過其間有惹大的變化沒有？真是蔽哉！瞽哉！至於以秦漢後爲封

建的，理同此駁。

(四)開阡陌提封疆，在政治經濟上都是一種解放的開明的運動，猶如河水從龍門向下流一樣，猶如出幽谷而遷喬木一樣。思想方面亦復如此。所以春秋戰國時代，各家蜂起。學術界開一光明燦爛之花。因為在政治方面，需要政治制度的改善，所以出了很多的政治家法律家；因為那時人民剛從幽谷跳出來，昏亂現象自所不免，弑父弑君，幾無國不有，所以就有很多倫理學家出現。厭煩這個昏亂狀態的，就有厭世的返古派出生；無所謂的，就在那裡談玄論理，作堅白異同之辯。在政治方面，經濟方面，思想方面，都帶着生氣勃勃少年氣，都在啓蒙而未成定型時，總之在這個時代，一切都是私的自我的，一反從前的公的死板的。政治方面集中獨裁；經濟方面私有獨佔；思想方面自成體系，這三方面的特性即凝結成一個專制主義的商業資本主義社會，而定型有秦漢的大一統。

## 一 商業資本主義

I 從秦漢以後直到現在，我將叫它是商業資本主義社會。商業資本主義在現在好像公認爲不能成一獨特的時期。我以前也會這樣想，但從社會的發展，及整個社會形態的轉變這方

面，仔細考究起來，却又未必真然。庫西涅（Kushner 亦譯庫斯聶）之主張並非完全率然的。胡秋原說：「在封建主義與資本主義之過渡期無疑形成一種特殊的社會形態，在西歐十五—十七世紀，俄國十八九世紀，中國自周末秦初至清末之大部分，這一個階段，究竟是什麼社會呢？最初，許多學者名之為商業資本主義時代。無疑，商業資本不能獨立地構成一種生產方法。」（讀書雜誌論戰第三輯亞細亞生產方式與專制主義）。他又引坡克羅夫斯基的話說：「商業資本主義的表現是可笑的，資本主義是生產之組織，而商業資本什麼也不生產。」可是你慢點笑，你如果從歷史的發展上注點意，你便覺得你的笑又是可笑的了。

2 說商業資本不能獨立地構成一種生產方法，說商業資本什麼也不生產，這都是皮相之見。這個皮相之見就是只注意於「商人通有無」這個純粹的表面的概念，他並未注意到整個社會的全體。如果只注意「商人通有無」，則商業資本除去古代社會及非商品的生產時代而外都是普遍的現象，所以也就不能特成一個時期。可是如果從整個社會看來，從歷史發展看來，從本質上看來，則所認商業資本主義實有其特性的。而這個時代名之為商業資本主義社會，實又比其他名稱為尤妥。

3 我們在本段上節曾提出兩個基礎形態為這個時代之所以然的本質，這兩個形態是：（一）農業與手工業的直接結合；（二）商人僱工人的生產關係，如果你說商業資本不能獨立

地構成一種生產方法，吾當說這兩個基本形態就是一個特殊生產方法，而這個特殊生產方法吾就叫它是商業資本主義。如果你說，商業資本什麼也不生產，吾說這兩個基本形態却生產什麼，而這個生產什麼的基本形態，吾即名之曰商業資本主義形態。這樣，商業資本主義倒不是一門泛泛的了，泛泛的乃是通有無這個概念，不是商業資本主義。

4 我爲什麼以農業與手工業的結合爲一個基本形態呢？曰自封建井田制崩潰以後，雖然由自足經濟進到商品經濟，但專門造商品的工場却還沒有。即便也有不過是手工業的製造法，而且是與農業相結合的，這兩種情形無非是表示（一）商品生產是自給生產的附帶物，猶如行有餘力則以文學者然；（二）生產商品者大半爲自給自足的自由農，這是農業國家從封建制度跳出來的必有現象，因爲它是附帶物，所以作爲商品的東西，仍不過是日常生活間的直接使用物。在二千年後的現在，你如果到鄉村的市鎮上看看，你就可以明白這種情形。有以大白菜爲商品的，有以木料爲商品的，有以手工所織的粗布爲商品的，有以稼具什物爲商品的。這即是從自足經濟轉變出來的商品經濟，因爲生產商品者大都是自給自足的自由農，所以生產物之爲商品不過只是通有無而已，但是這個通有無却是必須的，隨着社會的進化，人的經濟生活就日見複雜，一人不能兼百業，所以商人階級就應運而生。商人通有無，把社會的組織日見複雜起來，把社會的關係日見密切起來，它好似材料間的關係與條理，由它這

個關係或條理，就有個新形態表現出來，因為它負了關係或條理的責任，所以它在社會上就佔了一個很重要的位置，並且它還是對封建井田制時代所沒有的「一種東西」。它雖然重要而特出；但是它的「底子」或「材料」還是農業與手工業，即是說農業與手工業把它這個關係網填起來了，把它這個條理性具體化了。它限制了關係網，而關係網又組織了它。譬如一張桌子，有是柳木的，有是槐木的。這就是材料的不同之限制。因為有這樣的底子，所以專依通有無吃飯的階級所得的資本才是商業資本，而這樣的階級既是特出的又是必須的，復是關係或條理性，即是說，它盡了組織形態的責任，所以我們才說這個社會是商業資本主義社會。

5 我為什麼以商人兼工人的生產關係為基本形態呢？曰：在這個社會裡，特出的商人階級如上所說是負了通有無的責任，可是他不是一个機器命定了只負這種責任的。他如果自造自買自賣，不比純粹販人家的較好嗎？所以這時的商人階級既不純是郵差式的傳達有無，復不能作資本主義時代的純粹工場生產，唯其如此，所以商業資本不是一个泛泛的，也不是一個什麼不生產的幽魂淫婦，它實在是很能作事情的一個特殊生產方法。這個生產方法即是一人與工人的生產關係。而所以如此也是由于第一個基本形態決定的。因為第一個形態決定了商品的性質，決定了商品範圍的程度，所以在這個時代，商人階級實是一身而担負了工人商人資本家這三種責任的，這實在是很苦的事，但是這時代限住了他，他不能再向前走，這即

是他所以獨自成一個社會形態的緣故。

6 這第二個基本形態是很重要的。陶希聖先生的中國社會現象拾零第二章末附載一篇歐洲科學社會主義者論商業資本的譯文，其中就談到這層意思，且引如下：「封建生產方法的轉變，取兩條路：（一）生產者變為一個商人與資本家，而正與中世農業自然經濟及城市行會手工業相反對。這是真正的革命之路。（二）由商人以直接的手段占有生產。這條路在歷史上是一種轉變方法。例如十七世紀英國布商，把紡工收歸自己管理之下，賣羊毛給他們，且從他們買布。他們都是獨立做工的，但是這條路對於破壞舊生產方法並沒有多大貢獻，且寧可保持舊生產方法以爲其事業的前提條件。例如直到十九世紀中葉以前，法國絲工業及英國絲綢花邊業，不過在名義上是一個工業，在事實上却是一個商人。他讓紡工繼續在舊而無組織的狀態之下工作，實際上替管理他們的商人做工。這種方法都是真正資本主義的障礙，依後者的發達而當歸破壞的，它沒有革生產方法的命。他只不過破壞直接生產者的生活狀況，夷爲無產者，在那比已置於資本直接支配之下的無產者還壞的條件之下收奪其剩餘勞動。」這一段話中有可靠的，有不可靠的。例如商人兼工人這是與我們的見解相合的，可是他說這種方法是真正資本主義的障礙，則却於我們中國社會發展上不附。說商人故意保持舊生產方法以爲其事業之前提條件，這在歐洲社會之下容或有之，在中國社會中，却用不着這樣解

析。在中國社會之下，它決不是資本主義的障礙，它是由封建制度突發出來的一條必然的路，而且也是與以前大不相同的生產方法生產形態或經濟關係。在封建井田制之下，無論怎樣可能，也不能馬上可能到轉為資本主義。復次，我們不能說它沒有改變舊生產方法，就說它是保守的，它是資本主義的障礙。我在上段曾說過，人類社會到了某種時代，我們即不能完全以工具來決定社會形態。農業手工業的生產方法亦復如此，這種生產方法未變，而社會形態變了，我們不能不說這是一個新社會形態。我們此時所注重的是生產關係，生產結構，或經濟形態。那怕它是同樣的生產方法或工具。它也可以在不同的關係或形態之下存在着。例如資本主義時代的機器到了社會主義時代仍是照舊用着，其生產方法也照舊的維持着，但我們不能說這不是兩個絕不相同的社會形態。所以商人兼工人的生產關係決不是資本主義的障礙。它確是一個新形態。如果我們明白了這一層，則所謂「過渡」，所謂「半」，所謂「前期」，所謂「後期」，等形容字完全是用不着的。至於形容字下的那些「名詞」更是枉然的了。

7 由以上所說的商業資本主義這個特殊生產關係，可以萃乳出好多概念來。有專依貨幣交換於中取利的，從此所得的資本，便即是貨幣資本。這種貨幣交換純粹是流通現象，它倒是泛泛的；但亦為封建井田制時所未有。它是由商業資本主義引申出來的。它只要有交換過



程就夠了。就照現在說，大而至於銀行，小而至於錢莊，再小而至於鄉間的小市。這都是貨幣資本的表現，由貨幣資本，同時，也可以派生出高利貸資本，貨幣所有者，不願意他的資本睡着，所以除流通而外，他總設法使他作剩餘價值的生產。但在商業資本主義社會裡，它的機能即止於此了，它至多不過使它的所有者再成爲一個商業資本家。它不能再擴張而至於工業資本家的生產。或者，它至多不過使其所有者，成爲一個地主。同時，由地主也能變爲商業資本及貨幣資本。這就是地主，商業資本，貨幣資本，高利貸資本，互爲聯環，互爲限制的地方，也就是在中國社會裡，分業不清，階級不清的所在。這也許就是商業資本主義的特性。我們必須認清了商業資本主義，才能了解中國社會的組織與特性，才能解剖或發見它內部的關係或底蘊。

8 在商業資本主義社會裡，從生產關係中分化不出顯明的階級關係來。這是商業資本主義的最重要的特徵。自命爲革命的朋友，聽見此話必忿怒起來，以爲這是消滅階級關係。其實你如果先慢點怒，冷靜你的頭腦，切實觀察事實，必以此言爲不認。如果事實上有了階級，並非言語所能否認。怎麼無人否認近代資本主義國家中的階級的對立呢？革命的朋友所喊的階級完全不是馬克思所謂的階級，其實是朋友們腦袋裡邊的階級，其實是所謂閥閱。這種閥閱，這種閥閱裡的階級完全是專制主義政治下的產物。這是政治方面的東西。商業資本主

義社會中有許多歪曲的現象，奇怪的現象，不合理的現象，這完全是專制主義在那裡作妖，你如果以這些現象來認識這個社會，那就糟了。不幸研究中國社會者大半從這方面立論了。所謂奴隸，所謂封建，都是上了這個大當的結論。這種作法，完全拋棄了他們的經濟史觀的見地；然而却都自稱是馬克思的信徒，不從經濟關係方面看社會，却從社會意識，腦袋怨氣中看社會，這是多麼無標準。惟其這樣，所以王宜昌先生才能引証水滸傳來規定其社會形態論！

9 由封建制度的瓦解，變而為專制主義，由井田制的瓦解，變而為商業資本主義。專制主義與商業資本主義當其初出生時，是互相為用，互相限制，互相適應的。這種關係，據亞可諾夫斯基的見解，可以從三方面來說明。(一)官僚；(二)雇傭的常備兵；(三)貨幣租稅。官僚就是繼續着封主而來的吃俸祿的閱閱或層層身分。這種閱閱的官僚當然也是為前代所未有而是隨着經濟關係與政治形態的變化應運而生的。所以這種閱閱的政治制度是與商業資本主義相適應相限制的。雇傭常備兵更其需要商業資本的供給；至於貨幣租稅則是封建井田制的現物租稅廢去以後必有的現象，也是商業資本主義必有的現象。專制政治的國家必須需要反乎封建制度的商業資本經濟來供給他們的一切費用。而專制主義同時也維護商業資本的發達；但在某程度之下它也可以限制它的無限的發展。譬如漢代的重農抑商就是一個例

子。專制主義在各方面，總不予人以充分的自由，而且總是保守的。這就是商業資本與專制主義相適應相限制而自成一個特獨社會的所在。它在中國這種專制主義的淫威之下是不能發展到資本主義社會的。還有一個原因就是地理環境的自然封建。據有這樣豐厚的火鹽的國家總是時處是自足的保守的。

10 這種商業資本主義的時代到現在止，還是依然故我，人人都說自鴉片戰爭以後，中國已入資本主義社會，其實何嘗如此。鴉片戰爭後，如果政治修明，提倡商業，富國強兵，未始不能達資本主義之路，然而中國的政府沒有這種自立心，因之，帝國主義的進攻也日甚一日。可是，如果戊戌政變能成功，為時也不算晚；但戊戌政變也失敗了。自此益發不可收拾。民國元年起能奮發有為，也可以是資本主義發達的好機會；但我們所見的只是戰爭，而沒有建設。不幾年，民主政治與振興商業，一點未作，而又隨着十三年北伐成爲過去了。國民黨的口號顯然已成了社會主義的論調。但是自十七年北伐成功的國民黨，到現在止民治未作到，資本主義亦未作到；黨治變成了家治，社會主義更丟在十萬八千里以外去了。所以中國社會，到現在止，還是那種傳統的商業資本主義社會，它沒有機會進展到資本主義社會。現在的上海，天津，你要知道這是帝國主義的商場，體面是人家的。連日本貨都不能抵制，資本主義在那裡？

11 中國的社會至現在既未有資本主義，則我們要問是否還需要非走資本主義一路不可。曰不必。復次，如果中國現在為資本主義社會，其為資本主義必在初期，如是，按着馬克思的推測，則中國還需要走資本主義之路，而所謂無產革命全是枉然的了，現在既用不着無產革命，又用不着走資本主義之路。然則我們的路向是什麼呢？這在下段將論之，在此我們的結論是：如果不是資本主義社會，則無產革命用不着，而用不着再走資本主義之路，如果是資本主義社會，則早期的資本主義社會，無產革命仍是枉然的。結果無產革命在中國沒有意義。江西的紅軍其實不過是天災人禍逼出來的流氓爭天下而已，與中國以往之政變無以異，決不是資本主義社會內的無產革命。此點要認清。而現在之仍為商業資本主義，其因如下：（一）二十年來的混亂狀態，（二）帝國主義的宰割獨占與拘禁。本來自鴉片戰爭以後，中國很可以隨世界之潮流走向資本主義社會；但因內部的腐敗，外部的制裁，成了次殖民地，便沒有資格言資本主義社會了。

### 三 封建、封建專制、與循環或反復

1 本節願意把謬見略加以指摘以結束本段，我們先說封建。郭沫若說：「我們不要為文字所拘泥了。周室在古時雖號稱為封建，但事實上在周官有鄉遂縣鄙之分，並不是全無郡縣

。秦以後雖號稱爲郡縣制，但沒有諸王，唐有藩鎮。明末有三藩，清初有年羹堯，就是一般的行省總督都號稱爲封疆天子，並不是就不是封建制度。一照這樣說，中國社會史都當爲封建史，周朝之號稱爲封建，當然也是封建社會；但是郭先生却叫它是奴隸社會！這是按照什麼標準而立論？此非頭腦昏昏望文生義而何？郭先生以周官爲證，但周官一書，若照今天家的說法是漢劉歆偽造，此固未免太甚。可是就據錢穆先生有力的考證，此書也是戰國末年的產品，正在公田制崩潰以後，爰田制實行時創造出來，怎見得周朝有郡縣？又怎麼能以周官證明周之不爲封建？至于以諸王藩鎮，三藩，年羹堯，行省督軍，爲封建社會之證據，這又是望文生義得可笑了。如果照這樣推起來，省主席，是封建，縣長也是封建。賈之王義社會裡資本家各有其市場也是封建！這還成什麼說法？

2 隨之，王宜昌先生以爲中國的封建社會開始于五胡十六國，五胡亂華以前爲奴隸社會，五胡亂華後，異族佔據中原，中原世家南遷，成爲氏族社會，由此氏族社會在奴隸經濟的廢墟上建立起封建制度，封建制度起于此。這種見解實沒有絲毫道理，其所以這樣主張的動機，無非以中國社會屈就西洋社會，故不惜曲解歷史的真相。王宜昌先生說：「中國的封建制度，由于異族的侵入中原，和中原人民的南遷，氏族制度在奴隸經濟廢墟之上，重新組織着經濟，于是建立起來了，這好似羅馬帝國底衰亡，日耳曼蠻族移入南歐，以其氏族制度在

奴隸經濟廢墟上建立起歐西底封建制度一樣，……更可怪的，中國和西歐封建制度起源底時代，都是在第四世紀。」其實這完全不足怪，乃是你王先生曲解歷史胡湊付的。不然，在古代也有氏族社會，也有奴隸經濟，爲什麼不能封建起封建制度？在五胡亂華以前，也有氏族社會，也有奴隸經濟，爲什麼就不是封建制度，而特經以五胡亂華，就算是封建制度？難道五胡亂華，重新組織，氏族南遷，是封建制度的必然條件嗎？這猶之乎說一個人在此校爲教授，到了彼校教書，即不爲教授，一樣地不通，以後王先生即以僧侶寺院閭閻莊園行會等現象爲封建之論據其望文生義與郭沫若同，所以他們這種分期，不用從積極方面加以批駁，即從消極方面加以質問，亦足自亂其步驟，自潰其藩籬。

復次，王宜昌先生以中國自有史以來直至西晉都爲奴隸社會。秦漢以前且不論，因爲已有明顯的封建制度在那裡擺着，用不着多說，至於以秦漢至西晉亦爲奴隸社會，也是同樣地望文生義。在公的方面，他以秦始皇的築長城，造咸陽，建阿房，修馳道爲奴隸社會；在私的方面，他以「布韋家童萬人」，「嫖毒家童數千人」，「張良家童三百人」爲奴隸社會。這實在是豈有此理的胡鬧！以這種情形爲奴隸社會，這好像西晉而後，國家沒有大興土木，私人沒有家童奴婢一樣！王先生將何以處此？

4 朱其華先生從剝削方法而不從社會表面形態上斷定秦漢而後爲封建社會。此觀點已比

郭王的望文生義好得多了。但觀點雖對，而事實却不同。秦漢以後的剝削方法完全不同於封建井田時代的剝削方法。讀者只要細讀以往的討論，便可明白。官僚不是封主，地主也不是封主。其為剝削則，而所以剝削則不同。我們不能割去社會的有機之整體，而單抽表面上的一點以概括全體。我們當從生產關係，生產結構之整體，以及政治制度之形態上合觀社會之形態。如其不然，不但秦漢以後可以為封建，即資本主義也可為封建，這又犯望文生義之病了。本來從這種剝削方法或生產關係上看社會形態是本之於馬克思的意見的。據馬氏的意見是：表示社會形態的諸種發展階段之決定的目標，是生產方法及作為其結果的階級之根本關係，而不是剝削之現在的形態。馬氏用這種觀點規定封建的剝削關係說：「這種所有關係，同時必致表現為直接支配與隸屬的關係，因而直接生產者又必致表現為非自由者。這是明顯的事。這裡所謂非自由，是包含從徭役勞動的農奴制到漸次低緩了的單只買賦義務而言……他作為一個獨立的生產者，以經營其農業以及附屬於農業之下的農村家庭工業。……在這種條件之下，為的使他們替名義上的地主作剩餘勞動，無論是怎樣的形態，都不外是用超經濟的強制。」（資本論第三卷第二分），又說：「力役地租向實物地租之轉化，在經濟學上沒有引起地租本質上的什麼變化。」（同上）。這個界說與我們前所論的封建井田制並不違背，他這段話，我們所注意的是：（一）非自由的獨立生產者，此所謂非自由其實就是一

種自由農；(二)封主的超經濟之剝削，此所謂超經濟即指不參加生產關係而言。這是封建井田制的妥當的認識。至於他說力役地租與實物地租沒有本質上的變化，這也是對的，不過就是如此，也不足以證明秦漢以後是封建社會，也不足以證明秦漢而後的剝削方法同於秦漢以前的封建井田制。秦漢以後的剝削形態在本質上起了變化的。不能以力役地租與實物地租之無異，而證明此亦可無異。

5 所以如其要按此類比而證明秦漢以後為封建社會，還不如按此類比而證明其為資本主義社會，並於每一星期，以不同的政治形態冠其上。此仍可引馬克思的話作證：「並不是資本發明了剩餘勞動。在任何地方，只要那裡社會上是某一部分人壟斷了生產工具，那麼，勞動者無論是自由的或不自由的，於維持其自己之生活所必要的時間以外，還必須附加一部分額外的勞動時間，以為生產工具之所有者生產生活資料。固無論這種所有者是雅典之貴族，埃特魯之僧侶，羅馬之自由民，荷蘭之領主，美國之奴隸主人，瓦拉旗之莊主，近代之新式地主與資本家，都是沒有區別的。」（潘冬舟譯資本論第二分冊第三篇第八章工作日）。我於提筆寫本文之前，曾想按這段話把周朝以後統名之曰資本主義，而以封建的，專制的，民主的等政治形態冠其上以區之。後經細想，實是不妥；但却比那統名之曰封建社會的，又強得多了，合理得多了。因為封建論者，純屬望文生義，掛一漏萬，取捨無標準，政治與經濟



混淆。若以資本主義論之，則純從剝削形態上說，這是劃一齊同之處，而以政治形態別之，這是表示其各有不同。但實想這個不同，却並不只是政治形態足以盡之；而馬克思局謂同，實不過只是就剩餘勞動或額外勞動這個單純的抽象的概念而言。並不能舉盡了生產關係之特性。所以斷然擯棄此說，而形成了本文的分期。

6 剝削同，而所以為剝削不同。關於此點，仍可以引馬克思一段話以證之：「假定一個工作日是由六小時之必要勞動與六小時之剩餘勞動所組成的。在這種情形中，自由勞動者每星期所供奉於資本家的剩餘勞動時間等於六乘六即三十六小時。這就等於在一星期中，為自己工作三日，白白地為資本家工作三日，但是這種對勞動時間分配的方法並不是這樣可以很顯地看出來。剩餘勞動與必要勞動是混淆在一起的。因此，我們對於同此一樣的關係可以換一句話表示出來，就是工人於每一分鐘之間，有三十秒鐘是為自己工作。三十秒鐘是為資本家工作，在徭役勞動中不是這樣。譬如瓦拉旗農民為維持自己的生活而作的必要勞動，與他為其莊主所作的剩餘勞動，在空間上是彼此隔離的。必要勞動是他在自己土地上所作的工作，剩餘勞動是他在莊主之土地上所作的工作。因此，這兩部分工作，時間是彼此獨立存在的，兩者成爲前後次第分開的。在徭役勞動中，剩餘勞動及必要勞動是嚴密地分開着。很顯然地，這種在形態上所表現的差異，當然不能改變此剩餘勞動與必要勞動之間之數量下的比例

· 一個星期之中三日剩餘勞動總還是三日的勞動，對於勞動者自身總是沒有得着代價的。無論它叫做徭役勞動或叫做傭傭勞動，這是一樣的。但是，資本家對於剩餘勞動之貪求，表現為盡可能地無限制地延長工作日，而莊主的辦法較為簡章，直接增加工役的日數就是。〔同上〕。馬氏這段話是從不同以說明同；但其所表示的不同却不只是表面的，其同却有點似。資本家的貪求為無限，而莊主則為有限；資本家的榨取在同時同地，而莊主的榨取，則在異時異地。這都不只是表示表面的泛泛的不同，而實是一種有機的凝結的組織，各有其互不相同之特徵的，這種有機的整體乃是政治經濟的內在關係所凝成的。每一政治制度之下，必有一種經濟形態與之相凝結。我們可以分而解之，不可以湊而合之，封建井田制有其特殊的不可分的內部結構，商業資本主義也有其特殊的自成一整體的組織，推之資本主義亦復如此。

7 由這個原則，我們可說像俄國杜布諾夫斯基 (S. Dubrovsky) 那樣因徭役地租與實物地租之字面上的差異而分別出農奴制與封建制之不同實在是多事的。但是像胡秋原那樣根據着列寧的見解而在封建制與資本制之間（即秦漢以後）列出一個封建專制主義社會以與亞細亞生產方法相應，也是犯了同樣多事不正確的毛病。最近聽說胡秋原要出一本亞細亞生產方式與專制主義論，專門討論這個問題。但尚未出版，詳細證據不得而知，但據其廣告上所揭示的結論與讀書雜誌論戰第三輯中亞細亞生產方式與專制主義一文相同。所以現在就本他這

黨文章而批駁之。胡先生本着列寧與坡克諾夫斯基的封建制與資本制之間的理論而得出他的對建專制主義社會。茲簡述如下。

(一) 胡氏引列寧的話說：「農奴社會到處比奴隸社會更複雜。在其中，有商業發展之更大要素。這在當時已導入資本主義。」「在農奴社會，隨商業發達，世界市場發生；隨貨幣流通的發達，新階級即資本家階級出現了。」（國家論演講）。胡氏接着說：「這是說封建主義與商品經濟結合，發生農奴制度；然而農奴制度之基礎依然是封建主義。」

(二) 「然而，商品經濟侵入了。地主不爲自己而生產，爲出賣而生產穀物，於是強化對於農民之榨取。後來分有土地的制度，日益困難，……農民狀況日益惡劣了。

……於是農奴制度崩潰。」（列寧民粹主義經濟內容與司徒福（Strove）氏著書之批評）。胡氏接着又說：「這是說農奴制度因商品經濟而發展，又因商品經濟而衰落。」列寧以奴隸制及農奴制歸於封建制，其實也是望文生義的辦法。這且不提，至於隨着農奴制度崩潰後而來的商業資本主義是否也以封建主義爲基礎呢？

(三) 在此胡先生又引了坡克諾夫斯基的話以證明仍是封建制度：「在大彼得政策上演精神之任務者是商人階級。軍人階級是肉體，是物質力，是充實商業資本之要求的

。「但商業資本主義經濟，自然不能成立。在其中要有一種組織（System）。商業資本主義在農奴制度中看見這組織了。」（俄國文化史概論。）在這裡，問題發生了。列寧說農奴制度因商發發達而崩潰；但坡氏却說商業資本又建基於農奴制度上。胡先生沒有看出這個矛盾。胡先生是藉着坡氏的見解而建設其封建專制論，與列寧的意見並無關係。

（四）胡先生引列寧是證明亞細亞方式為一種封建專制主義。但列寧的話却並不足以證明秦漢以後為封建專制主義，並為亞細亞生產方式，列寧說：「只要莫斯科公國時代，有土地國有，則其經濟基礎是亞細亞生產方式。」（列寧全集第二版第九卷）。列寧所謂亞細亞方式即指中國的井田制或印度的小公社而言。胡秋原說他並不主張有什麼特殊亞細亞生產方式，這當然是對的，但他却並不主張農奴制崩潰後，商業資本亦為封建制，亦為土地國有，亦為亞細亞生產方法。這個亞細亞是指某時某地的並不是指一切時一切空的亞細亞而言。列寧又說：「領主為其支配及權力之維持，必須在對於他的服從上結合莫大的人羣，有使他們服從一定法律規則的機構，以維持領主對於隸農之權力。這實在是俄國，在至今日農奴制所支配的完全落後的亞細亞諸國，所存在的農奴制的國家。」但是中國社會至秦漢，農奴制已經隨着

商業資本的發達而崩潰了，並不是農奴制所支配的國家了。須知列寧所謂奴隸所謂農奴即指封建時代的耕戶而言。名之曰奴隸或農奴不過是無產階級的怨恨，並不足爲法，與郭沫若等人之望文生義，同一作用。所以由這段話，也不足證明秦漢以後爲封建專制主義爲亞細亞生產方式。

(五) 胡秋原完全本坡克諾夫斯基的見解而立論。坡氏以爲商業資本不能有其特殊生產方法，它必須在農奴制上找其體系或組織。但它又與專制主義相應。所以名之曰封建專制主義。這完全是名詞的瞎湊合。試問你以農奴制代表封建是什麼意思？是指封建時代的生產工具而言呢？還是指那時代的經濟關係而言呢？是指政治制度而言呢？如果純指生產工具而言，則吾前面已經說過，社會發展到某程度，不能純以工具決定社會形態。如果指經濟關係而言，則商業發達後的經濟關係完全不同於封建時代的經濟關係。如果指政治制度而言，則封建制度早已變質而爲專制主義了。這樣，坡氏所謂農奴，所謂封建，也完全是捕風捉影，不足爲據的了。然則，封建專制主義還有意義嗎？如是胡秋原的結論完全倒塌了。

(六) 胡氏說：「所以，如果要應用亞細亞生產方式這名詞，那末就是指中國或印度之先資本主義制的複合方法（農村公社與封建農奴制之結合），就是指亞洲的專制主

義。可是如果我們証明了列寧的話與胡先生的意見脫離關係，則這個結論完全無用。又說：「中國東周的封建主義，因商品經濟之分解，發生變質而為專制主義，自秦至清末，就在這一個階段。」因此，中國現在社會是帝國主義統治下的先資本主義社會，殖民地化的專制主義社會，而這社會的基礎剝削是封建式的榨取形態。因此中國現在社會是半殖民地化的封建專制主義社會。」可是，如果坡克諾夫斯塞錯了，這個結論當然也是錯的。所以胡先生的見解仍是封建論者的濫調。不過有一點我們同意，即他不承認現在是資本主義社會。但是我們也不贊成他所謂先資本主義這個名詞。如果我們認清中國社會是有機的發展，則即不當用「先」字「半」字等給西洋史作奴隸的名詞。

封建專制論者開銷了，我們再略提一提循環論者。這是王禮錫先生的主張，他把秦以後這一階段，稱為謎的時代。可是他的解決法，除了提出專制主義以外，再也不見得有什麼了不起的見解。而對於專制主義與其經濟形態之出生關係及特徵，亦並未指出。他的反復或循環論是見之於他的「中國社會形態史上兩個反覆現象」（新中華第一卷第五六兩期）一文。這反復論是解答秦漢以後，這一段歷史為什麼這樣長久不變這一問題的。這一長段歷史究竟是什麼形態，王先生的結論還未得出（也許可以走到胡秋原的結論上去），在此只批評他

的停滯不變的反復論。他說：「秦廢封建，成集權專制主義後，商業資本發達。直至五胡亂華，恢復了現物交換而造成了封建之廻光。是爲第一反覆，是爲秦漢專制主義之第一段。自五胡十六國的北朝至宋末爲一段，此亦爲商業資本發達時之專制主義。到遼金元之侵入，在中國形成奴隸制度的大帝國，是爲第二反覆。一直至清鴉片戰爭，是爲第三段。中國竟沒有走上純資本主義社會的道路」。這樣，中國之所以反復，是由於游牧民族的侵入，是野蠻征服了文明。五胡亂華是封建制度的反復，元之侵入是奴隸制度之反復。有此兩反復，所以中國的社會形態，才會停滯而不進。在此我們要指正的是以下諸點：

(一) 王先生所說的反復是現象，不是原因。

(二) 所謂反復，其實就不是反復，乃實是混亂，一切暫入停頓狀態，無政府狀態。

(三) 因此五胡亂華並沒有恢復了封建制，乃只是混亂而已。戰事熾然，萬事却步，徒有現物交換，不足以證明其爲反復爲封建；封建也是望文生義的想當然耳。

(四) 遼金元之侵入也不能算是奴隸制之反復。奴隸制根本不能成立。名元之侵入爲奴隸時代也是秦始皇築長城之類的奴隸論。

(五) 混亂可以阻碍社會之進步，野蠻民族之混亂更足以阻碍社會之進步。但不能說這是反復，反復是某種制度之重新出現，五胡亂華與元之侵入實在不能說是他們在組

續着什麼制度，王莽如果成功了，我們可說他是井田制的反復，此外則未之見

（六）所以中國之所以停滯不進，決不是由于反復，乃是由于專制主義之壓抑及大陸地理之自然封建。在這種閉關自守的亞洲天下內，在這種無爲而治的專制主義下，社會的經濟生活是笨牛式的演化着。經過一次混亂，則即却步一次，豈止五胡亂華遼金元之侵入而已哉？近數十年來，中國社會並未見進步，混亂故耳，帝國主義之文明，雖遠勝于游牧民族；但他們並不以文明來化你，却以商品來吸取你的血。都市肉化，而鄉村破產，這並不是中國社會的進步。

## 四 依然故我

1 在才段二節之末，我曾提到現在的中國仍是商業資本主義社會，近數十年來的混亂，並未使中國向外前進一步，趨于新形態，現在再繼續着，稍說一點。有一部分人主張現在還是封建社會。帝國主義維持中國的封建勢力，永不使其統一，此亦有然，但封建勢力不同于封建制度，我們不能以勢力當作制度，自然不能說現在仍爲封建社會，有一部分人主張現在是資本主義社會，帝國主義要扶助中國向資本主義路上走，以便銷售他們的商品，此意或然；但與結果相反。所以帝國主義的扶助只是向奢華路上走，只是一天一天地向畸形的發展的



路上走，所以中國永不能到資本主義之路，焉有關稅不自主國家不獨立而能為資本主義乎？焉有只消費而不生產之國家能為資本主義乎？焉有受帝國主義之保護扶助離間而能成為資本主義乎？中國不脫離次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的地位，不能言資本主義，中國當前的急務是在統一政府，修明內政，不受一切帝國主義的離間與扶助，即便有所藉賴，亦得有個我在，關於此點讀者，可參看本誌二卷一期張君勳先生論外交政策一文。

2 吾論中國的社會形態發展史至此止。對於以前有正確的認識，對於現在始有真確的行動，封建制度崩潰後，商業資本主義社會完全是多方面的，並且前後也總有聯系，藕絲不斷的遺傳下來，不能截然分明，但是于每一時期，在政治經濟諸方面，總有其前後不同的特徵在。我們必須認識這個特徵。我們不能以那些藕絲不斷，餘音嫋嫋的殘留現象為規定時代之標準。這即是我所以選定商業資本主義這個名目的所在。

3 復次，我們必須認清專制主義的特性：（一）它是一人之下，萬民平等；（二）有平權而無自由；（三）無為而治，安居樂業；（四）保守性大，進取性小，禁止的而非放任的；（五）在某種程度下，允許你的自由，但不能無限，自己不為，也不許人家為，必須認清這點，始明白中國為什麼始終停滯不進，要走資本主義的路，非打倒專制不可，可是中國把專制也惟倒了，商業競爭也提倡了，民治提倡了，黨治也實現了，結果還是一塌糊塗，依然

故我！這不能不說是一切提倡全是虛偽，這也不能不說近數十年來是在混亂狀態，是在內憂外患的狀態。

4 從專制主義之推倒，本可走上資本主義之路；但混亂了數十年，機會也失去了。我們現在著手建國，當然用不着再走資本主義之路。但中國又必須走到生產的路上去才可。所以現在的問題是怎樣造產的問題。下段再提示。

5 復次，我們研究中國社會必須把中國社會看成是一個活的有機體，它有它自己的發展不能以西洋社會史為標準，也不能以西洋的社會形態之名目的意義來解析中國社會。讀書雜誌論戰中諸君子完全犯了此弊。就是馮友蘭著中國哲學史也不免此弊。他不承認中國哲學有近代，這就是以人為準的劣根性，（此意見他的哲學史下卷講義稿，尙未出版。）

6 最後，本文用了以前發表過的新原則解析社會之出生長成與特變，如不迎刃而解，馬克思之經濟史觀只可當作一種方法看（as a method）始稍有意義，若當作根本原則看，或曰「社會元學」原則看，那完全不中用。此意賀麟先生常提及，其意是從經濟方面看社會可，以其為唯一的基礎或決定因子則不可，所以本文也完全注意經濟形態之不同，凡一概念弄明白了，必有其範圍與界限。決無容視為神秘，視為萬能。

## 丁 計劃經濟時代的國家社會主義。

### 一 縱的衝破橫的

1 在本段裡不想多說話，因為這種主張與計劃在本誌第一卷諸期上已有張東蓀與張君勱兩先生的詳細論列，我這篇文章的目的在從歷史的發展上規定出我們的使命，只要我指出以往的社會非向這條路發展不可，則目的算已達到。所以現在只簡單的提出幾個特點以使前後相銜接即可。

2 數十年的混亂不是無益的，因着它，中國不走資本主義之路，因而也用不着無產革命。而唯一的出路即是國家社會主義，以國家冠之，即是縱的衝破橫的，現在的國家無一不以民族或國家為單位，即蘇俄亦莫能例外，無祖國無國界雖成爲無產階級之心理，但此心理亦必爲有條件的，這種心理是抵不過民族心理的；雖或在遙遠的將來許爲高明的理想世界，但現在的事實尤其是中國的事實不允許這種有害無益的言論出現。

3 因爲中國未走資本主義之路，所以產業落後，當前的急務在造產，而造產又非資本主義國家的遺產，乃是以國家的力量進而免去資本主義的流毒，即是說，乃公造非私造，這就

是國家社會主義的必然性。即按之蘇俄亦何嘗不是國家社會主義，不過他是一黨專政罷了，所以凡產業落後的國家而不走資本主義之路的，則必然是走國家社會主義之路，中國不欲脫離次殖民地的地位則已，欲要脫離，則此爲必然之路。

## 二 計劃經濟

I 這種國家造產即是計劃經濟，中國到了這步田地必須有一種大智慧大計劃大人工來改造，決不能純任其自然，這個大智慧即是建國的有機的大系統，在這個有機的系統之下，一切都有其中的一個內在因子，凡此種種張東蓀先生在第一卷第一期中有詳細的論列，計劃經濟的形態如下：

- (1) 大規模的產業，非個人所能辦者，由國家經營，免去資本主義的剝削形態。
- (2) 在某種程度之下，承認土地私有，耕者有其田。反對一切收爲國有，不然，則與封建井田制有何差別？
- (3) 在某種程度下，承認自由營業。
- (4) 取締不造產的遊離分子。此遊離分子包含流氓，僧侶，鄉紳，纨绔子弟等而言。

## 三 政治系統

1 這種經濟形態完全是一個整個的政治系統中的產物，這種政治形態不是一黨專政；但並非不承認政黨之存在。政黨與階級不同，中國的階級根本不清楚，尤其從經濟方面分化不出顯明的階級來，產業落後的中國，根本找不出階級政黨來。亦找不出階級革命來，所以現在所需要的還是一種民主政治；但不同於近代歐洲所流行的民主政治。民主政治的本性即是自由平等，但結果却適得其反。所以現在必須免去此病。中國的現狀非需要一種整重嚴肅偉大猛進的政治系統不為功。歐美式的那種浪漫個人肉麻的風氣完全用不着，此計劃經濟，政治系統之所由來也。詳細情形亦當參看張先生之文。

#### 四 革命問題

1 現在國民黨的政治之壞是無容否認的。國家不統一也是顯然的。革命的舉動當然也不能反對；但怎樣革法倒是問題。敵對最顯然的是共產黨，共產黨在反對政府上我們並不反對；但（一）他們的革命是否就是無產階級革命？（二）他們這種革命是否能成功？這兩個疑問我們都以否定答之。即一不是無產階級革命，乃不過是陳涉吳廣之流亞耳。這種革命之發生半由於政治不良及天災人禍為其原因，這是機會好，革命的對象並不像資本家那麼顯然。因此（二）革命就不一定能成功，即便成功也不過是政權的取得，步蘇俄的後塵，步國民黨

的後塵，或甚至步劉邦步朱元璋的後塵也都可能，而決不是革資本家的命的勞工階級專政，因為中國這種機會造出的流氓革命是很有轉變的可能的，假若機會一失，他們這種革命集團便馬上成爲茫然的而消散了。所以如果他們成了功，從好的方面說，能替國家造產，不實行資本主義，而實行國家社會主義，從壞的方面說，步國民黨的後塵，投降帝國主義，無論白色或紅色，而結果仍是混亂。

2 須知現在的國際（蘇俄也在內）仍是爭商場的國際，而資本主義仍未到山窮水盡之時，同時，中國又是帝國主義控制下的不獨立的民族。所以現在的急務是在求獨立的政府，健全的政府，而在無產階級革命。無產階級革命無論在理論上在事實上都是不合於中國的一切的運動或主張，表面上無論怎樣不同，只要它是進步的有爲的，在骨子裡，它總要走到國家社會主義這條路上。

3 以上是就政治經濟方面的改造看社會的形態，這是政治經濟方面的革命，至於遺傳的或後天的不正當的思想或意識如所謂封建意識，封建腦袋，依賴心性，浮淺誇大，失去自主，等亡國現象，皆須根本剷除，而另造成一種風尚。這種風尚的革命，一方面固須政治力量之轉移，但思想上的宣傳與認識亦足成一時之風。此屬另一問題，將專文論之。

二十二年，十一月十二日

# 選舉與代表制度

鄒文海

## 第三章 代表制度的理論與實際

### (一) 十八九世紀採用代表制度的必要

代表政治，有人就稱之謂間接民主，實在是不很新亦可以說不很舊的制度。在古代的國家中，民主是直接的，沒有舉幾個代表去討論政治的先例，所以代表制並不是很舊的制度。不過近代代表制度的開始，當在英國，也已經有好幾百年的歷史了，所以也不能說是一種新的創見。美國獨立成功，仿照它姊妹國的習慣，採用代表制度。以後繼續美國而成立的民主國，又多沿用它的成例，所以代表制度的勢力，一天一天擴張。現在雖有許多反對代表制度的運動，但在事實方面，則英美法德諸國，依然採用此種制度。它於二十世紀的世界中，仍舊有鞏固的基礎。由是許多守舊和好古的人就說：「代表制既是祖宗遺留給我們的，那它一定不會差的。它是經過淘汰以後獨留的碩果。」這種話我不敢相信，我要進一步探求美國為什麼要接受英國的習慣，以及怎樣又把這種習慣傳播到各個民主國家去的緣故。

美國獨立以後，所以一定要採用代表制度，恐亦為事實所限制。當時的人，都以為直接

民主祇能適用於城市國家。盧梭說：國民一定要大家都知而知心，然後民主的理想，才能實現。但這在美國是不可能的。交通的不便，使大家沒有接觸的機會，而幅員的廣大，更使全國的利益，不會一致。在這種國家中，盧梭的理想，當然是不容許實現的。同時我們知道美國是英國的姊妹國，許多制度，是從英國傳過來的。英國是實驗代表政治最有成效的國家，所以美國就不其然而然的採用代表制度了。我並不和蒲脫勒 Butler 一樣，以為美國的代表制度，是一般建國元勳精心考慮的結果，（註<sup>1</sup>）而比較相信它是當時環境的產物。

美國初建國時，一般人以為議會反映一切人民的意見，（註<sup>2</sup>）換言之，即是全體人民的替身。這種制度的所以需要，完全因為一個會議廳中，不能容納全體人民。（註<sup>3</sup>）他們並沒有想到這是人民制裁政府的機關。加稅案件，雖一定要經過議會的通過，但誰亦不希望從此可以操縱國庫。開國的元勳，大多是分權主義的信徒。他們相信立法司法行政三個機關，立於同一平面上。並不以為祇有議會是人民的代表，應當有節制行政機關的權力。代表機關並不是制裁政府的工具，而自己即是政府之一部，議會的權力，除憲法規定外，別無限制。議會是人民大會的替身，於精神方面，總希望和人民親身在開會一樣。（註<sup>4</sup>）

議會既是人民大會的替身，所有代表的權力，是否絕無限制？代議士運用智慧的範圍，由選民規定抑有自由施展的餘地？依照民主的理論說，則代表須絕對服從人民的意思。但當



時守舊的分子，都不能相信代議士僅僅是公民的委托人（Delegate）。他們雖採用民主政體但於人民的智識能力，都很懷疑。他們相信議會若以公民的意見為依歸，則議會勢必停頓進行。當時參與憲法會議（Constitutional Convention）的人，誰能知道當時公民的意見是怎樣的？（註5）他們若不把自己的學問，自己的經驗，作為自己的領導，而一定要問人民的意思怎樣，那美國的憲法，恐怕到現在還沒有成立。柏克 Burke 的話，（註6）在他們各人的腦海中迴旋。他們自信不應是各州的代表，而是憲法會議中的議員。他們當為全美國的利益着想，而不當僅僅顧到他們所代表的州郡的好惡。在這種環境中的人，能限制代表的權力，與委托人相等麼？

當時憲法會議中的各州代表，既把議會看作人民大會的替身，而同時又不把代表的權力加以限制，使他們非順應人民的意思不可，這實在是種矛盾，但這種矛盾，當時的人是不能想到的。他們祇知道大民主國必定要有代表制度，而同時又知道人民的意思並不容易表示，所以祇有採擇那時所必走的途徑，——那就是設立一個有無限權力的代表機關。

很奇怪的是這種矛盾的制度，會從美國傳到法國，再從法國傳到近代一切的民主國家。它傳播的迅速和遼闊，幾等於疫病，這到底是什麼緣故呢？當然，最大的原因還是盧梭小民主國，理想的失敗，繼美法而成立的民主國既沒有柏拉圖五千零四十人的理想國也沒有盧梭

希望中的城市國家。它們疆域的廣大，不容許人民聚集在一處開討論大會。它們都不得不採用英美的習慣，把代表機關來替代人民大會。

同時我不能不想到那時所以一定要採取代表政治另外的幾個原因。第一我們知道當時人民的智識，也不容許直接民主的實現，久經專制政府束縛的人民，雖會因過分的壓迫而反抗，但並不就有取而代之的能力。這一點就是盧梭也考慮到的。他勸波蘭的人民不必急進，而還應當襲用舊時的制度。不然「難於消化的自由」，就會在它胃中作怪引起嚴重的疾病。（註7）這驚人的譬喻，自然一定會引起一般人的注意而法國多次革命的經驗，也可以證明盧梭並沒有無的放矢。大家因為他的告誡，更因為當時事實的證明，以致雖有剷除專制的決心，但結果仍不得不把政權交給少數人去掌管，這是人民不能自己治國的悲哀，這個悲哀，亦許一直保留到現在。

第二，提倡直接民治的人雖以為人民非親自執行政府的職務，則人民主權一定要變成幻想，但他們不得面對事實。當時的人民，是否都有閒暇去執行政府的職務？無論十八世紀的國家，不比古代的雅典或斯巴達，全體人民聚集在一處是不可能的。就說這個難關可以打破，他們又怎樣可以時時使人民放掉他們的工作，到大議廳中做立法官或執法官呢？到現在我們對於選舉還多以為是必須減輕的義務。無怪當時人不能接受直接民治的理論了。

直接民治在當時既是不可能的理想，那新近推翻君主地位的人民，自然必須要想出一個可以替代的制度由是他們把目光轉移到英國的代表制度，以爲這可以解定他們目前的難題。他們自信採用代表制度以後，人民的地位，不致像以前一樣低下了，他們的主權，也時時有利用的機會了。爲這樣的信念所驅使着，跟隨美法起來推翻專制政體的國家，也一個個採用代表制度了。

## (二) 代表制度過去的經驗

好，代表制度因不得不採用而採用了。但施行以後給我們的印象如何？那我一定要嚴重的告訴大家，這是一齣悲劇——一齣合理想幻滅的悲劇。我們不會一點不知道巴那馬主義 (Panamaism) 在法國是什麼意思。(註 8) 我們亦不會一點不知道美國「狼狽現象」(Lobbyism) 的事實。(註 9) 至於英國歷史上枉情賣法的舉動，當然也能很清楚地印在我們腦海中。神聖的代議士，不過幾個企業家的走狗，貴族院中的爵士，身上披掛的乃是金錢的徽章。人民的痛苦，不能在議會中得到回聲；人民的希望和要求，也沒有在代表機關中盡量的表現。法國議會中所看到的祇是政黨的運用手腕，合縱連橫，以謀私人的利益，並不爲人民的福利稍作打算，美國的國會也是分贓的總機關，算不得人民的喉舌。就是英國，它的幾種改革運動，依

舊也要人民自己發動，議會是不能代表人民意思的。

我並不故意要把現在的代表制度攻擊得體無完膚，這實在是它本身的缺點使我無法遮蓋。而且這種缺點，已經成爲家知戶曉的事實了，就是要想遮蓋，也勢有所不能。真正愛護代表制度的，不如把它的缺點，整理出一個系統，使大家明白代表制度的缺點在什麼地方，而想個改良的方法。這也就是我所以要有下面一段敘述的緣故。

1 那補人或那種團體選舉代表 按理說，代表應當人民自己推選的，因爲祇於自己才能知道人民的利益。但事實並不這樣。漢姆芬男 *Gerhard Finer* 告訴我們說：選舉中的候選人，是已經得到權位的人爲選民檢定的。選民祇能在極有限的範圍之內選擇他們的代表。（註10）這種普遍的情形，祇要稍微留心政治現象的人，都不會否認的。除非生長在沒有代表制度，或不用選舉方法的國家，我們不會一點不知道人民選擇代表的自由，常常爲某幾種團體或某幾種人所剝奪。我曾經詳細的說過，選舉票上的候選人，是政黨的幾個中心人物指派所。政黨圈定幾個人告訴選民說：這是你們應當推舉的而人民要是不服從它的命令，他們的選舉票，就會失去効力。政黨藉企業家的幫助，有雄厚的經濟勢力，可以利用報紙的宣傳，金錢的賄賂，暴力的威脅，以至演說家中人肺腑的說辭，藝術家動人魂魄的標語，使它的目的總可以達到。政黨是常常有許多人會跟了它的領導走的，你若單獨的反抗它的命令，這

會等於蝗蟻當車，平白地犧牲自己一票的價值。

在這裏，我可以略為說說歐美各國的政黨對付選民的手段，他們有的開設盛大的招待會，把電影和冰其凌去引誘選民，這在美國是頂盛行的。有的在熱鬧的街市中演說，宣傳自己的德政，攻擊對方的失策，這在英國選舉衆議員時常常可以看見的。更有的吸收青年黨員，造成一種基本勢力，以爲將來選舉戰時招募勇士。這是德國和意大利政黨時用的策略。其餘如散布宣言，分貼標語，登載廣告等等這是每個國家的政黨都用的，不過程度上稍有不同罷了。總之，它們費了不少精力用盡種種方法，要使人民都相信祇有它們的政策是可以行的。人民生長在這種環境之中那有不爲它們迷醉而信仰它們的道理。由是選民變成了木偶，政黨變成了後面牽線的人物。選舉團體不過是表面上推選代表的機關，而政黨的黨魁，才是派遣代表的主角。

關於這許多，我相信大多數人都很明瞭的。然而結果怎樣呢？因爲前面說的種種緣故，代表機關中的議員往往是政黨雇用的私人。他們知道受命於黨，而不知道政黨之外，還有全體人民的利益。這種現象，實在很普遍的，並非落伍的國家單獨如此，我記得有一個敘述英國政治制度的人，以爲英國衆議員，比較自由，可以隨便發表意見，不受政黨的支配。（註 11）其實英國政黨的領袖，同時亦是議會黨員的領袖，議會黨員都受他約束的。這樣看來，

我們能相信英國的人民代表，不受政黨的支配？

代表既受政黨的支配，而政黨又必須和大企業家合作，由是所謂人民的代表，間接也要受大企業家的支配。這樣，近代的民主國家，財閥乃是政治的中心勢力。以往政治家擴張選權的運動，不過裝成一個民主政體的空架子而已。

我並不想把代表制度的過失，都推到政黨身上去。因為政黨不過做了代表和企業家的中間人，僅僅使某種買賣容易進行而已。這種中間人的消滅，買賣一樣依舊會進行的。除非議會的立法，不致影響企業家的利益，或是議會中的代表，個個都是潔身自好者，這種各人所承認的罪惡，決不會中止的。現代議會中的罪惡，決不都由政黨造成。而以前英國沒有政黨的時候，枉情賣法的事情，一樣也會在議會中進行。（註<sup>11</sup>）使代表制度招惡名的，是金錢的魔力，不僅僅政黨才是惟一的罪人。

2 那種人當人民的代表 一般人都不相信思想家所說的代表是民衆的喉舌。這實在是必然有的結果。人民的代表，並沒有理想中那樣精深的學問，博愛的心腸，能了解人民的利益，能為人民的利益而奮鬥。他們間或為一地方爭取特殊的權利，這不過為繼續競選時留一個餘地，並不真為那地方着想。他們的當選，並不完全因為選民的擁戴，而因為得到有力者的幫助。我們以前曾好幾次說過：這樣政黨去決定競選中的候選人；這樣政客和政客和政黨

連絡，就可以有當選的希望。這就可以曉得代表應當感謝的，是政黨，是扶助政黨的企業家，他們祇代表這許多特殊階級的利益，而不能為人民作喉舌的。

亦許大家以為我的話是說得過分。政黨所推薦的代表，未必就祇知道服從政黨，而一點不為人民的利益着想。但我們何妨觀察實際情形，看看那一種人是人民的代表呢？

a 小組織和黨魁 我們若用分析的眼光，去審查一下人民代表的履歷，就可以知道這裡面有許多是黨魁和小組織中的份子。所謂黨魁和小組織中的份子，並非是政黨的領袖，而是利用政黨以造成自己地位的流氓。這種人，常常願意在後台牽線，而不願意自己到舞台上充角色的。但有時為環境所迫，也有親自粉墨登場的，在今日的政黨政治中，各人都會充分的認識黨魁和小組織所佔的勢力。他們直接的或間接的操縱國家的政府。他們的目的在攫取私人的利益，而所用的手段，往往是卑鄙醜惡的。這種手段，雖為法律所禁止，不過為勝利以後的贓物，他們不惜冒這樣大險的。由是前面所說的賄賂，威脅等等，都一幕一幕的開演了。結果，不是這黨勝利，就是那黨上權而人民則同樣有受他們侵害的危險。官吏的位置，做他們封賞忠僕的贓物，（註13）國庫的財產，看作他們私囊中的資本。官吏的數目一年一年增加，國庫的支出一年一年增加，但公共的事業，差不多變為沒人管理的事業。

近來有人為美國城市的黨魁做傳，我們試翻開一看，知道他們好多是沒有受過高深教育

的人。智識的淺薄，使他們不知道國家利益爲何物。而生性的詭賊，又使他們喜歡弄權。不幸而這種人竟充當了人民的代表，那人民自然祇有任其爲所欲爲了，人民的唾罵不能使他們離開罪惡，權利的篡奪，才是他們勾心鬥角的事業。一旦當權，他們就想永遠當權；一旦失勢，他們又想再謀大舉。以他們的努力，以他們的手段，他們不難矇過選民忠厚的眼光，而選舉他們當代表的。

b 大頭 (Fat Cat) (註14) 黨魁和小組織之外，當人民代表的還有所謂大頭。他們大多是有錢的富商。但年齡的衰老，使他們不再有經營的野心，而同時却又生了熱烈的官迷一個經濟慾望已經滿足的人，往往需要在社會中有點權威。這種人，金錢的消耗是在所不惜的，因此做官的目的，很容易達到他們祇要願意和政黨接洽，就不致失敗。而政黨一方面，也常常樂於接受這項要求的。它有的是工作人員，推舉上幾個代表，原沒有什麼困難。但成功以後酬報是不會少的。根德 (Gibb) 很滑稽的告訴我們，大頭的當選，可以使工作人員添一件新外套，地方領袖備一輛新汽車，而一邦的領袖可以到歐洲去旅行一次。(註15)

c 政黨的傀儡 上面所說的兩種人，一種憑藉霸道，一種藉金錢，而現在所說的一種是專靠運氣的。一黨亦許有幾個聲勢相稱的領袖，在這種時候，可以爲各派利用的傀儡上台了。這種人好比舊劇中臨時湊上的丑角戲，爲的是好讓後台的角色有充分的準備。他們上台



的目的，並不要博得一般人的掌聲，不過要使人不討厭而已。我們知道一個政黨若發生裂痕，這是它將要衰落的預兆——英國的自由黨就可為我們證明，政黨的各個實力派不能調和時，為避免瓦解的危機，自然祇有捧上一個能在各方面討好的傀儡了。這種情形，我相信是不少的罷？所以，一個沒有主張的庸人，祇要時運相濟，也可以坐上代表的座席。

我們若走進美國或英國的議院，亦許可以發現這三種以外的人，但總可以視出這一種人佔有議席的大半，這三種人——政魁，小組織中的份子，大頭，和政黨傀儡——他們都不會明白自己的職責的。他們甚至根本不明白人民的利益，怎能為人民的利益而奮鬥。他們的所以得到座席，因為他們霸道或富有，並不是因為得到人民的信任。他們亦許說過動人的標語，但決不能幹動人的事業。（註16）

3 代表機關怎麼進行賣法。有人會很諷刺的說：代表受國家的待遇是很薄的，但他們大多忽然間稱富了。亦許他們善於積蓄，不過往往積蓄的數目，比收入還多。（註17）貪貓嘴偷吃幾條小魚，在中國原不算什麼大事，可是歐美的著作家，往往不能放它過去，一定要提起筆來大書特書，由是差不多什麼人都知道高貴的代表，同時亦是舞弊的專家了。

代表機關可以允許或否決特權和獨佔權，同時亦可以發給公司的特許狀。因為這個道理它和企業家常常發生密切的關係：不僅如此，稅率的增減，保護貿易或放任主義政策的決定

，都直接可以影響商人的利益；所以商人對代表機關的行動，實不能不加以注意的。有許多預先結交政黨，每年送相當的津貼，使不利於他們的法律，不致在代表機關通過。又有的請熟悉代表機關的人為他們疏通，使它通過某種有利於他們的法律，這在美國就是所謂「狼狽主義」。「狼狽」這個字，可以說用得最廣的，凡是用方法去影響代表意志的都可以說是「狼狽」。有的用精緻的宴會，妖冶的藝妓，去聯絡代表；有的利用老代表的資格，出入於代表機關，和代表中有力者相結納，而企業家的要求，就在暗中進行了。（註18）這種人的手段是敏捷的，局外人幾乎不能探悉秘密。他們的勢力是雄厚，往往有報紙做他們的後盾。他們的計劃必能實行，他們的慾望，必能滿足。他們是代表和企業家和政黨共同需要的中間人。

亦許代表機關進行賣法的方法還有好多，但知道這一點亦很够了罷？我們可以從此推想到代表機關中討論議案的情形。有金錢為背境的提案，它們是隨到隨討論的；有時因為不同利益的衝突，亦許還有幾幕熱烈的口辯舌戰。至於真正為全民利益的提案，却永遠不會引起一般人的注意，冷靜地堆置在主席台上或委員懷中陪伴塵土。直到代表機關將要閉幕了，方始拿出若干來胡亂地通過或否決。（註19）這是代表機關為人民爭福利的惟一時間，聽了能不寒心。

我們可以聽到許多攻擊代表政治的呼聲。內中有許多以為這是不能解決經濟上不平等的

制度。(註20)在代表制度之下，富人更富，而貧的人更貧了。這當然都是代表機關偏愛資產階級的結果。倘使代表機關能以全體人民的福利為它們的目標，有利於工人的勞工法規，限制大資本家的累進稅率，也許可以一條一條的變成法律，而社會間經濟分配的不平均，也不致像現在這樣利害了。現在代表機關通過的法案多極了，但因為它們的通過，都憑藉不正當的勢力，所這種法律大多是無益於人民的。無怪大家對於代表機關的功用，要感覺得失望了。

### (三) 反對代表制度的言論

歐洲大戰的結果，不僅是世界生命財產的損失；即是人類的思想，也不覺改變了方向以前一致崇拜的民主政治，現在有人懷疑。以前被壓迫的勞工階級，現在要起來獨裁，支配財閥的命運了。在這樣偉大而劇烈的轉變中，代表制度也跟着動搖起來。獨裁制度的勃興，使我們不禁懷疑民主是否最高的理想，而代表政府能否實現民主的理想？舊的度量既已失去了功用，新的標準又已代之而興，一切舊的不成問題的問題，到現在重新有引起激辯的可能。我們看了前面所說代表機關腐敗的歷史，不難猜到它將來的命運。它的徇私，它的賣法，以及它所表演的一幕一幕的罪惡，都成家知戶曉的事實了。當今的人民，除非十分守舊的

，都在想：代表機關沒有給我們好處，它祇給我們痛苦。代表的制度，應當要立刻取消。我們大多數的人，已不是如美國初獨立時那樣幼稚，祇要有個民主政體的假面具就可滿足。我們亦沒有當時的人那樣容易欺騙，政客的花言巧語，大多再不能迷醉我們了。

反對代表制度的，第一個我們可以舉英國的柏羅克 Belloe。他反對代表制，但恐怕更反對直接民主。他斷定代表制度所以失敗的原因，為代表機關權威的旁落，他相信議會所以有光榮的歷史，因為它有貴族的精神。英國下議院的生命，當自一六四九年開始。（註21）以後它的地位有扶搖直上之勢，而光榮與尊嚴，亦逐漸增進。但到現在，它又逢着泰極否來的時期。貴族的色彩，業已蕩然無存，而下流的醜名，反倒播於宇宙之間。它的生命，已經到了無法挽救的地步。

在斷定代表制度將要衰亡這一點，柏羅克和旁人是一樣的。不過他預測繼續代表制度而起來的政體，不是直接民主，而是集權的君主。柏羅克對於君主的解釋，和旁的人一點不同。他並不擁護禪位的皇室，也不一定說帝皇的在位時期，要和他的生命一樣長久。但他相信政府的行政元首，必須負絕對的完全責任，處理國家一切的政務。換句話說，他玩了柏拉圖所弄的把戲，極力避開制度的善惡問題，而過分去信任賢人政治。他的負絕對完全責任的行政元首，大概和柏拉圖的哲君是沒有兩樣的。我和一般人的態度一樣，以為哲君倘然可以得

到，而這個哲君又可以保證他永遠是哲君，那國家的一切政治制度恐怕真是無聊的東西，所可惜者，哲君不易求得，而且今日的哲君，過了多少時候亦許就不是哲君，所以制度方面的問題，我們還是不得不加以考慮的。

爲什麼柏羅克相信巴力門一定要崩潰，而代之而興者是集權的君主呢？他的論證，倒是很值得注意的。他認定英國的代表制度是種寡頭政體，以少數人的勢力，去支配國家的命運。但這種寡頭政體所以能有光榮的歷史，都因爲它有貴族的精神。議會中的代表，都是受人尊敬的上等人，而這種上等人的能幹，又確實可以受人尊敬。當拿破崙嗚咽叱嗟於歐洲的時候，英國的下議院中，充斥着從「腐化自治邑」(Rotten Borough)派來的代表。但它居然會決定反抗拿破崙的策略，滑鐵盧一戰，卒使英國的地位，更形崇高。在下議院的手中，英國的殖民地，散佈了五洲；在下議院的手中，英國海上的霸權，乃能在握；英國今日的人民，沒有一個能忘懷它以前的豐功偉績。但是現在，什麼都完了，它的權威，好比過去的夢幻；它的尊嚴，也像雲煙一樣消散。人民尊敬它的熱情，已經降低到了零度。下議院貴族精神的失掉，實在是敲它喪鐘的原因。(註22)

柏羅克的見解，完全不能代表大多數人的意思。他祇是反代表制運動中突起的異軍。他的注意點，僅僅集中於英國的現象，所以不能一般的普遍的討論到代表制度的得失。他說巴

力門所以要崩潰的原因，雖值得我們參考，但君主的思想，恐怕不是一般人願意接受的。現代的政治潮流，雖說有從民主轉入獨裁的趨向，但這個趨向能否不再改變，還不容易預測。就一般人的好惡而說，他們對民主的理論固多發生厭倦，但依舊不能對獨裁制度表示好感，更何論君主政體呢？在名義上做過主人的近代人民，大多不願再去當實際上的奴隸罷？這個心理方面的問題，我們是不容忽視的。

一般人反對代表制度的原因，並不和柏羅克一樣。代表機關沒有完成它理想中的職務，才是大家對它失望的緣故。蒲脫勒說：大家所以不滿意於代表機關的，（一）因為它沒有很迅速的順應公意；（二）因為它容易為私人獵尋利益的工具。（註<sup>33</sup>）這兩個缺點，剛好破壞我們對它的理想。我們以為代議機關的精神，等於人民的全體大會，但事實上它不能適應公意；我們以為代表機關是為人民全體而存在的，但事實上它是私家獵尋利益的工具。它所做的和我們所想的，恰恰相反，我們怎能不為這虛有其表的骷髏失聲痛哭。大家都知道代表機關假面具所遮蓋的是什麼猙獰的面目，怎能再無所責難的安於這種制度之下？我們需要改革，不能再扶了這骷髏做行屍。我們在第一個人宣告代表制度腐敗之後，大家都回到過去的創傷，大部分是受代表機關的賞賜，戰爭和戮殺，在代表機關的決策之下進行。失業和飢荒，因代表機關的法律而產生。有產的雖受到它額外的偏愛，而無產的則受到無辜的侵蝕。維

持正義的人，自然要振臂而呼，謀適當的解決；而身受創傷的，更不能不挺然而起，要推翻這個害人的代表政府。

（註15）現在的代議機關，真如卡萊爾 Carlyle 之言所中，是不能做出什麼好事的機關。它把不配與國政事的人，搬去討論國家大事，其結果則壞的變成更壞，更壞的變成頂壞。（註24）商人政客，我們知道是沒有資格籌劃國策的，但他們的勢力，足以闖入莊嚴的代表機關而有餘，居然也可以旁若無人的享受政治家的尊嚴，就是擁護代表的痴人，也要宣告說這個制度應當停止了。（註15）坐在議廳中的代表，雖不至都是能說話的毛驢，但高出的程度也不會很多罷？

從理論方面說，代表制度實在是不能不有缺點的。人民能否選舉好的代表，這是須可懷疑的。就說這不成問題，但國家中供給的人材，是否毫無限制？一縣有一縣的代表，一省有一省的代表，一國又有一國的代表，難道國家就有這樣多量的人材麼？現在代表民主國最感困難的問題，就是如何使政府的效率增加。（註26）國家既不能供給多量的人材，而代表政府又需要多量的人材，所以祇能把庸愚也湊雜進去了。在這種狀態之下，政府的效率，怎能不減低呢？

又有許多主張多元主權的人，他們感覺代表機關是不能解決近代社會中的經濟問題的。

最近賴斯基氏又向代表的民主政治轟炸，使它又搖搖欲墮的危險。他說：以往代表民治的所以勝利，那完全因適合於它的特殊環境。在從前，殖民地的財源，可以盡量供給帝國主義者的榨取，所以帝國的經濟是富裕的，足以填塞各種人的慾望。但現在不同了，國際間商業的競爭，使資本家不敢允許勞工的要求。因為他們需要價值低廉的出品，不然，出產品的銷路就會斷塞。而同時，殖民地也覺悟過來，努力於保守自己的利益，帝國主義者榨取的機會，因之完全喪失。這樣，貧民階級感覺得他們沒有受國家的保障了，他們經濟上平等的權利，似乎都為代表民治之下的制度所剝奪。如何去解除這個經濟上的不平等，實在是代表民治碰到的難題。已經握有政權的階級，他們和專制時代的君主一樣，不願意交出他們特殊的權利，結果是近代的代表民治的地位發生了動搖。

歸結以下所說的，攻擊代表制度的人，有的以為代表已失掉貴族的精神，有的以為代表機關沒有迅速的順應公意，有的以為代表機關容易為私人獵尋利益的工具，有的又以為它不能解決經濟上不平等的問題。他們為代表制度所定的罪狀，似乎都是最後的，但為代表制度辯護的人，是否就會結舌莫能致一辭呢？

#### （四）代表制度的價值



講過代表制度的歷史和大家對它攻擊的言論以後，我們就可以進一步討論討論它的價值。反對代表制度或咒罵代表制度的，可以把它說得一錢不值，而擁護它的，也有本領把它捧上天去，不過這種感情用事的批評，我們絕不能用來估計代表制度的價值。

但是代表制度的價值如何？要知道這個，我以為應當先回答下面的幾個問題。

第一，我們要問：需要代表制度的物質環境，是否已有變更？代表制度的經驗，固然給我們一個普遍的失望，但它也是因我們的要求而出現的。何以我們以前需要它，而現在又厭惡它呢？這或者是時間和空間變遷的緣故，不過我們需要代表制度的環境，真的都已完全消失麼？這又未必。無線電話的發明，可以使一國的人民，如坐大會場中，聽聆偉人的演講（註27）但各人能否自由討論，收護互相商量的效果？報紙勢力的雄厚，輿論制裁的靈便，人民的意見，已不必借代表機關發表，但報紙輿論，和代表機關有什麼不同，它們一樣是可以被惡勢力侵蝕的東西。我們現在處於比以前更廣大更複雜的社會中，代表制度的重要，或且更甚於昔日罷？波拉特 Polakoff 說：大的國家，雖能沒有巴力門而存在，但不能沒有它而施行民治；城市國家，雖能沒有代表機關而實現民治，但不能擴大它而不喪失人民的自由。（註28）我方才說過，雖在科學昌明的近代國家，便利的交通，間接使國家的幅員縮小，迅速

的無線電話，使偉人的演說有廣播的機會，但數萬萬的人民，還沒有開一個全民大會的可能。我可以肯定的說，代表制度依舊是現代必須要的制度。

多 譏笑代表制度的人，往往抬出他自己以為更高的理想。然而一個理論的所以有價值，在於實際上所生的效果；而所謂真理，也不是和事實相背反的原則。人類中固然可以有走出時代一步，而為人羣作領導的，但制度的改革，一定要等到環境的允許，時機的成熟。就是普通稱作理想家的盧梭，也不會不顧科西嘉 Corsica 和波蘭的情形，而要它們接受社會契約中理論。（註29）比代表制度更高的理想自然有，但這種理想是否能適合今日的環境？柏拉圖哲君的理想自然是高超的，但因為哲君的不易求得我們祇能從制度方面改良政治的局面。代表制度亦許是過於陳舊了，但要是它能比較的適合於今日的環境，那它還是應該保留的。

多 第二，我們要問代表制度是否本身就具有缺點？世界中常常有很好的制度，因為在壞的環境中而得不到好的結果。民主政治在經驗是失敗的，但是否從此即可斷定民主為不可行的政體？若然，我們對於它的行於英美而顯有成效，將有什麼解釋？創制複決還不能在美國有圓滿的結果，（註30）但不因能因此即抹殺它在瑞士的成績。一種好的制度，一定要在好的環境中施行，才能得到理想中的結果。不然，中華民國國家就可給我們的榜樣。

現在的代表制度，大家承認不必有很好的成績。但這是否由於自己的弱點，這實在是值

得考慮的。如果它的弱點是本身所有，我們可以直捷地放棄它，不必再爲它曲辯。但如果這是從壞的環境中產生的，那我們不妨設法改造這種壞的環境，不必根本推翻代表制度適合於近代社會的需要，那祇要它不是不可救藥的惡劣，我們應當灌溉培養，使它有個健全的生長。

代表制度的所以失敗，或者因爲治者的愚民政策，使人民沒有選擇的能力；或者因爲公共道德的墜落，使人民不以選舉爲公權的行使，而以爲做買賣的機會，這種種，我們可以看得很清，完全不是代表制度自己帶來的缺點，而是社會中遺留下來的罪惡。代表制度既沒有教人結黨營私，更沒有教人納賄受賂。這是好究的人性，造成了代表制度失敗的原因，我們不應當責備代表制度，而祇可以責備有缺陷的人性。

既已清楚了這兩點，我們就很容易爲代表制度辯護了。柏羅克的見解，完全和民主的精神相反，我們如以爲民主的政治，已經到了衰亡時期，他的理論尙有討論的餘地。但第一章中已經說得很清楚了，民主政治還是應當保留的制度，所以他的見解，實在是不用反駁，而且沒有立腳點的。至於批評代表制度沒有達到理想，那完全是惡的人性所造成也不能是代表制度的遺失。人民要有相當的智識，堅貞的節操，那他們所舉的代表，也不致出賣人民的利益。若是說國家不會有足夠的人材，以充人民的代表，在這種情形之下運用任何種制度都

要失敗不能說是代表制度獨有的缺點。任何國家，它政治上的效率，都要因人材的多寡而增減，並不能說祇有代表制度是需要人材的。

多元主權論者的論調，那是最值得我們注意的。但代表制度是否不能解決經濟不平等問題？換言之是否代表制度的精神，一定和經濟平等的精神相衝突？再說清楚些，那就是政治的民主和經濟的民主，有什麼不一貫的地方呢？我想了很久，總想不出有了政治民主就不能有經濟民主的道理。政治的民主，不可以作為取得經濟民主的手段麼？而且政治上沒有平等的人，是否能取得經濟上的平等呢？賴斯基說：代表制度之下的人民，他們經濟的權利是剝奪了的，苦的人變成更苦。窮的人變成更窮。這種鐵的事實，不就可以推翻我理論上的假設？但近代經濟的危機，是否完全是代表制度的產物？任何一個能精細觀事的人，都不會覺得把近代經濟方面過失，推到代表制度身上即是可以安心的。就如賴斯基所舉經濟不平等所以發見的兩個原因，殖民地的自覺和國際貿易的競爭，這難道都是代表制度造成的麼？現代的經濟危機，完全是社會中以往種種的積因造成的，而代表民主適當其會，要來解決這個難題，我們怎樣可以說這個難題的發生，就因為有了代表民主呢？

我們不但消極的說代表制度是近代需要的制度，而它的失敗，不是它本身的弱點造成，而還可以積極說一說它的好處。代表制度是一種制裁政府的工具。福特 Henry Ford 以為議

會之能够制裁政府，這是英國特殊的習慣造成的，並不能以爲代表制度即有制裁政府的功用。（註31）這幾句極有深刻意義的警告，自然可以使我們多一個反省的機會。但說議會不能有制裁政府的功用，那是不可信的詰責或彈劾政府人員的事實，總使我們深信代表機關制裁政府的理論。在這裏，我要附帶的說到以往所以要採用代表制度的動機。十八世紀的所以採用代表制度，一面固因爲事實的限制，而一面也因爲覺悟到人民不一定要使用主權，而祇要他們是主權的來源，他們的利益，就會得到保障。換句話說，他們覺悟到不必自己執政，而祇要有制裁政府的權力，治者就不能爲人民之害的。由是他們採用了和這種理想相合的代表制度。代表制度的發生，就因爲它是制裁政府的工具，說它沒有制裁政府的能力，那等於根本否認代表制度有存在的價值。

代表制度實在是分工的社會之下所必須有的制度。我們如果不反對民主的理論，而一方面又擁護分工的原則，那爲調和這兩種主張，代表是必然有的產物。人民而沒有主權，他們一定要變成治者剝奪的對象，人民而必須親身運用其主權，分工的原則必爲打破。人民爲保衛他們主權者的地位，而又不遺棄政治專家的供獻，人民不得不有求於代表制度的。在代表制度之下，政治專家既可以得到相當的地位，而人民的主權，也絕不會有被否認的危險。

擁護代表制度者所擬的假設，自然有許多是失敗。最明顯的，人民未見得能選舉專家做

他們的代表。但這種假設的失敗，並不是代表制度本身的弱點。在賄賂公行的社會，要智識低陋的人民去選擇代表，這當然不能有好結果。但人類努力的結果，不一定都要令人失望。我們現在所認為是不得不採用的代表制度，將來亦許可以產生幾樁積極的好處。

有許多並不擁護代表制度，而以為不得不採用制度的人，他們相信代表制度，是從專制政體到直接民治的一種過渡工具。(註12)這種說法，最少在近代的中國是有用的。我們就是相信賴斯基所說的代表制度的成功是一種過去的榮譽，現在它已經不能解決經濟上不平等的問題了。但在中國，我們應當相信這還是不得不採用的制度。經濟的不平等，是政治平等以後才發現的，換句話說，政治沒有得到平等的人民，經濟上是不配談平等的。對於政府的行政，我們尚沒有說一句話的機會，更從何說起要求經濟權利的平等？這好比還沒有能說話就想讀書，那是很可笑的。宣傳經濟革命的人，還是改變他們的旗幟，而一致的來要求政治上的平等罷：

根據了上面答案，我們很容易決定代表制度的命運。它是近代需要的制度。它現在雖有缺點，但這是惡劣環境造成的，不能說是它本身的弱點。我們現在還不是為它撰寫誌銘的時候，我們要注意它的生長，使它健全，使它成功。

註12 Nicholas Murray Butler: Why Should we Change our Form of Government, Ch. I, pp. 6-7

註 2 威爾遜 James Wilson 以爲國家議會應直接自人民產生，庶可以爲人民意見之繕寫本，這就是說國家議會應反映一切人民的意見。M. Farrand: Records of the Federal Convention I, p. 561

註 3 塞爾登 John Seiden 說：代表議會是必需的，因爲一個羅事廳不能容納全體的人民。Carpenter:

Democracy and Representation, ch 2 p. 39

註 4 Carpenter, op cit ch 2, p. 48,

註 5 威爾遜說：至於人民的好惡，我們很難知道。(Farrand. I. p. 258) 馬的孫 Madison 亦說：要人民的意見爲我們的領導，我們就很難說要怎樣行了。

註 6 柏克一七七四年在布里斯托爾 Bristol 的演說辭中有這樣的意思：國會是一個國家的會議，它尊重整個民族的利益；在這裡面，地方目的和地方偏見不應當做我們的領導，我們要在國會中得到的整個民族的理智所產生的普遍利益。見 Lord: The Principle of Politics pp. 183—174.

註 7 Vaughan: Political Writings of Rousseau

註 8 德人得爾布律克曾云：「巴拿馬主義」這幾個字，已經變爲腐敗議會的專門名詞了。它的起源，因爲巴拿馬運河公司，曾納賄法國下議院，引誘它改變關於該公司的許多法律 Delbruck op cit p. 17

註 9 美國的 Lobby 這一個字，實在很難解釋。而它廣義的意思，無非指希望利用不正當手段，以求議會通過彼等企望的法律或否決不利於彼等的法律。關於這種事實，在美國是很通行的。

註 10 Herman Finer: *Theory and Practice of Government*, Vol. I, ch. 12 p. 444

註 11 OGB: *British Government and Politics*, p. 570

註 12 潘立德 Peritt 告訴我們好幾個以前英國用金錢去購買議席的列子，而最有意思的，自然算鐵樹森 Innes Tilson 用一千四百磅買做克里克刺達 Chicklade 的代表的故事了。他一定要安穩地坐下議院中十四天以後，才肯付這筆賄賂的錢。若在這幾天內發生阻碍他的錢就可以不付了。把議席這樣做買賣的，真是亘古少見。

註 13 民主國家中分贓制度之最盛行者，要推美國。伯爾拿 Bernard 論之甚詳。A. P. Bernard: *The Degradation of Our Politics*, Forum Vol. 9<sup>th</sup> p. 117 off

註 14 Frank Kent *Political Behavior*, ch 5, pp. 51—63

註 15 同上

註 16 伯爾拿說：職業化的政客，常常同情於好的主張，但除非和他的利益一致，他是不能幹好事的。Bernard: *op cit* p. 122

註 17 Kent: *op cit*, p. 124

註 18 Herrug: *Group Representation Before Congress*, ch. 3 From the *Old Lobby to the New*, pp. 30—50

註 19 Bernard: *op cit*, pp. 12—125



註20 H. J. Laski: *The present position of Representative Democracy, in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August, 1932, pp. 629-641*

註21 研究英國，「巴力門」歷史的人，都知道這個制度的開始是很早的，遠在一六四九年清教革命之前。不過克林威爾 *Cromwell* 以前的議會，不過是帝皇的咨議院，一定要到清教革命以後，它才有獨立的使命。我們很可以開歷史家不可信的附會，而接受柏羅克的主張，英國下議院的生命，實自一六四九年開始。

註22 Belloc: *parliament and Monarchy*, ch. 1 pp. 9-14

註23 Butler: *op cit* p. 11

註24 Froude: *Carlyles life in London*, see pollard: *The Evolution of parliament* p 1

註25 同上

註26 Julia H. Gulliver: *Studies in Democracy, 3 The Efficiency of Democracy* pp 64-98

註27 Jandray: *The Essentials of Democracy* pp. 26-27

註28 Pollard: *The Evolution of Parliament* p. 4.

註29 普通人都說盧梭是理想家。過一個深受孟德斯鳩影響的人，決不致完全不顧事實方面的問題。看他代波蘭和科西嘉所草擬的憲法，我們可以得到一個證明。他差不多勸波蘭人安於他們的貴族制度，因為他相信久困於專不是人民的制能享受自由的。這種種地方，都在告訴我們，就是一個理想家，也不能一視事實。

註 30、武德朋 Woodburn 說：美國新制複決罷免等制度，尚在試驗時期，不能斷定它的優劣。Woodburn：

*Political Parties and Party Pref. m.* p. 50j

註 31 Henry Ford: *Representative Government*, Second Part, ch. 1, *The Means of Control* pp. 15-1, 21

註 32 羅德 Lord 以爲擁護代表制度的人，最少有四種假設，第一以爲人民能選好的代表；第二，以爲好的人願意出來競選；第三，以社會中才智的供給是無限制的；第四，以爲選舉的舉行，可以使人民對於政治的興趣增加。Lord: *op. pp.* 160-161.

# 蘇聯計劃經濟之進行

L. S. Ronin 著  
孫寶毅 譯

十一月革命局建立之原素，實決定過去十多年來蘇聯國家經濟發展之途徑焉。此數原素即無產階級之專政；土地大規模之工業，銀行和運輸之國有，所有基本生產工具私有之廢除，以及國外貿易之獨占是也。十一月革命後，無產階級政府因當時掌握經濟之首要地位，及新經濟政策之根據，遂開始一有系統之奮鬥，此奮鬥即掃除資本家之成分，及使小規模之農村經濟，轉變至大規模之農業生產是焉。易言之，即為計劃經濟之奮鬥，亦即為建設一社會主義社會之奮鬥。

此奮鬥之結果為如何耶？

蘇聯之國家經濟因與帝國戰爭，及因內戰，革命及資本主義國家干涉之結果，曾一度遭受悲慘之衰落。工業品之產額於一九一三年時，其價值為五、六萬億盧布，至一九二〇年則降至一萬億戰前盧布。農業之受害亦極烈。於一九一六年時，耕田面積總數為二八一、六兆英畝，及至一九二〇年則減去百分之二十五，穀之生產總量則減去百分之五十。至於鐵道運輸專業則可謂完全瓦解。於一九一三年時有火車頭二〇、〇三〇輛，至一九二〇—二一年則祇剩留一八、七五七輛而已。火車頭失修之百分率，則由一九一三年百分之一六、三，增至

一九二一年百分之六十二。

## 國家經濟之恢復

內戰告終後，蘇維埃政府即廢棄以前出於不得意的戰時共產主義政策，進而採取新經濟政策。在新經濟政策之下，其第一步工作，則為重工業之迅速恢復。而欲此步工作成功，則又須依賴於農業生產力之恢復。

蘇維埃政府為鼓勵生產力之發展起見，允許農人私自出賣其剩餘產物，並使農業工業之間成立某種市場形式之關係，政府明知此種措施於生產與消費範圍之內，勢將不免鼓勵某種資本家成分之發展。然而此不可避免的資本家成分之發展幸有下列數法遏制之，即國有工業之恢復和穩定，及國有工業和農村間，由合作制度所造成之直接的經濟上下之連絡等是也。以上諸方法以及限制資本家成分之政策，其目的或在去除私有的資本家本形式之經濟，及社會主義之發展也。

蘇維埃政府之計劃擬先行恢復重工業，為社會主義立一經濟基礎，漸後逐漸實行一九二〇年第六次蘇維埃大會所議決之電氣化計劃，再後勸誘大多數農民加入集合農場，如是而後，全國經濟，技術上之社會建設，社會主義的工業之發展，及創立大規模社會主義的農業之

基礎可以堅立不拔矣。

此即實施新經濟政策時，於列寧指導之下，所起草之建設社會主義之計劃大綱也。此大綱後即成爲蘇維埃政府經濟政策之基礎而決定蘇維埃國家經濟之性質及發展之速率。

自一九二一年至一九二六年可謂爲國家經濟之恢復時間，蓋傾全力於恢復國家之工業，農業，運輸，貿易，商品之週轉，及貨幣之流通等是也。

在此時期中，大規模工業之總產額增加五倍，一九二一年時爲一，七七二兆盧布，至一九二六年增至九，一二〇盧布。（一九二六—二七年時價格）

至於農業，一九二七年時耕種面積爲二七九兆英畝，於一九一六年時則僅二八一，五兆英畝而已。家畜之總數一九二五年時亦超過於一九一六年。

在斯時，工業恢復之速率與農業不僅有密切之關係，抑且大半有賴於農業恢復之速率而促成者也。當時之中心問題，乃爲流動資本，糧食，原料，貨幣等問題。一九二一年時，全國工業之在政府掌握中者，其資本爲數已有四，七兆戰前盧布之鉅。因此政府遇有許多急待解決之問題，及急待進行之事業，若命令已閉之工廠，重行開工，以及增加效率低下工廠之生產量等等皆是也。此外，政府復亟力設法恢復農業之生產能力，藉以解決糧食及原料的供給問題。同時又增加工廠產額及促進勞工之生產效率，爲國有工業，尤以生產消費品之工業

，資本之積集與發展，謀一健全之基礎。至於貨幣流通問題，則因通貨之安定及信用制度之發展，亦已解決，遂使國家經濟，尤其是工業界能得到短期信用之運用。

政府又從穩定及改善國家預算入手，以謀重工業之恢復和發展。其結果遂使資本投入工業者日增——在一九二一及一九二二年時其總數僅幾十兆盧布而已，不足以抵當跌價之損失——一九二五—二六年時則已增漲至八一—一盧布。

不論因與帝國戰爭，及因革命和列強干涉之故，所受損失如何慘重，蘇俄竟能在最短期間，恢復其本國之經濟，抑且較歐洲各國尤為迅速，此等國家在歐戰時所受之損失實渺不足道，此誠值得注意之事也。且也，自歐戰以後，能事貨幣置於一堅固健全基礎之上者；蘇俄實不愧為第一個國家。此外，吾人更當注意者，即蘇俄國家經濟之恢復，能如是之神速，係完全出於自身之力量，自身以外，毫無些微外力之資助也。

蘇聯之經濟，有數大優點在焉：廢除所有生產工具之私有，包括土地，一也；全國主要財源集中於無產階級政府一人之手，二也；而此種財源之分配，又按諸計劃，三也。此數優點，在恢復時期，已甚明顯。

當新經濟政策採用之初，以計劃為準繩之恢復國家經濟一問題，早在熟籌之中。當時會指派國家計劃委員會，擔任調查全國糧食及燃料財源之工作，以便按照此種調查得之估計，

而決定何種國有事業，可傾全力以實行之，何種事業可租出之，以及何種事業可以暫緩施行。雖則市場關係之發生，及新經濟政策初實施時，盧布價格之跌落，甚不利於國家經濟計劃之發展。然而當時曾起草許多種爲各部工業，預算，農業，信用等等設想之計劃。在起草計劃時，市場之種種原素，佔一重要地位。蓋欲以計劃爲治理市場無政府狀態之工具，而使市場受國家之統制和規定也。

嗣後，通貨日益安定，國有工業，貿易，及合作制度，日益發達，計劃之基礎遂能趨於穩固，於是計劃之範圍爲由各工業單獨之計劃，進而爲一全國經濟之整個大計劃矣。此整個的計劃初次見於所謂一九二五—二六會計年度之全國經濟統制數字中。吾人於此所應注意者，即此計劃雖未及完備，不能包羅國家經濟之全部，然而其影響於經濟生活之恢宏者，未可忽視之也。

## 工業化

國家經濟之恢復，日見進展，蘇聯工業化之政策，亦隨之而日顯其重要矣。此政策之效果，於恢復時期之末年，已能見之。一九二四年生產品（甲類）產量增加百分之二十四，消

費品（乙類）產量則增加百分之三十九，至一九二五—二六，生產品與消費品之產量，兩者之增加已幾乎相等，即百分之三十四至三十五。及其後數年，生產品產量之增加率竟超過於消費品者矣。生產品增加所以如是之速，實由於鼓勵投資於此種工業之政策，所促成者也。資本投於甲乙兩類之分配如下表：

一九二五—二六

一九二六—二七

一九二七—二八

（單位百萬盧布）

甲類

四九一、四

七三七、二

九六九、〇

乙類

一七八、六

一九四、〇

二六八、一

全部工業

六七〇、〇

九三一、二

一、二三七、一

至於蘇聯經濟將來之發展方向如何，則有一先決之要素在焉；是即蘇俄政府不以恢復戰前狀態或國家經濟各部分間之相稱之發展為滿足，而由總計劃所決定。此總計劃乃用以促成社會主義之建設，吾人所謂五年計劃者是也。

而戰前之生產量，在規定各種工業間新的關係之原則下，既已到達之矣。一九二六—二七年時工業中百分之九一，三為國有工業，百分之五為合作的工業，私有的資本家之工業，僅百分之二，三而已。鐵道運輸則完全操諸國家之手。信用制度亦然。尤有進者，商品貿易



於一九二六—二七年時，由國家及合作社商業組織所經營者竟佔百分之八十有強。而且，中等農人即不從事剝工之農人，現已成爲農業之中堅人物。於一九二七年時中等農人於總共耕田面積中即佔百分之七一，六，於所有之牛馬則佔百分之八〇，七，於所有出賣於市場之產物中，則佔百分之七十一。雖資本家之成分於城市及鄉村間，略有增加，然而以全國經濟言，彼等之勢力，確已衰落矣。

◎ 資本家之成分，於農業方面，其地位較爲堅固，蓋其時小規模之農業，仍佔重要地位，此乃有助於資本家關係之生長也。然而農業之發展，不能離乎工業。小農村之發展趨向，乃由社會主義城市之發展決定之。農村中資本家之成分，不惟爲農村中勞動民衆所反對，且爲無產階級專政全盤之整個制度所不能容。又何況無產階級政府現今握有國家經濟中之關鍵，以及其他合作社等等之雄厚力量哉。政府當局以有計劃之力量，加諸農業，則可知實此種因素，以決定蘇聯農業中資本家之命運也。

### 工業化之步驟及國家費濟之再造

自國有工業及社會主義其他重要部分，在全國經濟中成一有力之原素後，恢復時期遂轉入再造時間。於此時，國家及合作社所經營之商業，在全國貿易中亦佔一主要地位。在國家

經濟中，社會化企業 (Socialized Sector)，其任務最爲重要，而其發展係決定經濟發展之總方向。

在進入再造時期之際。基本工業傾其全力以應時代之需要。於此時，有一羣中產階級經濟學者，倡下降線 (Descending Curve) 學說，據彼等言，將來蘇維埃之工業，其發展速率，將日漸傾下，因其資本，終有窮竭之一日故也。其後始證明此種學說乃破壞蘇維埃工業之陰謀耳。至於此學說之是否正確，吾人且不加可否，吾人所應注意者，即國有大規模工業，自進入再造時期後仍以空前絕後之速率繼續發展，可於下表中見之：

	總額	超過前一年之百分比	甲類	超過前一年之百分比	乙類	超過前一年之百分比
一九二七	10,767,6	12.1	4,855,8	15.1	5,911,6	11.7
一九二八	13,669,0	26.9	6,153,0	26.4	7,516,0	21.4
一九二九	17,331,0	26.7	8,001,0	30.1	9,330,0	33.9
一九三〇(預計)	33,488,0	29.8	11,401,0	43.5	22,087,0	18.9

(單位百萬盧布，一九二六—二七年時價格)

於上表中，吾人可見重工業(甲類)發展之迅速爲何如。

蘇聯工業化之性質，不只可以工業與農業之發展相比較，指明之，且可以生產產品之工業與生產消費品之工業，兩者之發展相比較指明之。於一九二六年，生產品之產額佔工業總產額中百分之四，四，於一九三〇年則已佔百分之五〇，三。依照計劃，於一九三一年時，將佔百分之五八，七。

工業之產額與農業之產額之關係，如下表：

	一九二六	一九二八	一九二九	一九三〇	一九三一（計劃）
工業	四七、一	五一、一	五七、九	六二、七	六七、三
農業	五二、九	四八、九	四二、一	三七、三	三一、七
	100	100	100	100	100

（百分比率）

大戰前，工業品之產額，於全國經濟中佔百分之四二，一；於一九二七—二八增至百分之四十五，於一九二九—三〇，竟過百分之五十。蘇聯本為農業的工業國，今一變為舊工業的農業國矣。同時，農業又在基本的變動之中。

於諸工業中，發展最速者為冶金業，機器製造業，及電工業。各主要工業發展之比率，列於下表：

單位	電力	生鐵	鋼鐵	捲鐵	煤	油	農業機器	電工業
百萬瓩時	千噸	千噸	千噸	千噸	千噸	百萬盧布	百萬盧布	百萬盧布
一九三三	一、九五五	四、二〇〇、〇	四、三五〇、〇	三、五〇〇、〇	二八、九〇〇、〇	九、三〇〇、〇	六七〇、〇	四、五、一
一九三六	三、五〇七	二、二六九、一	二、九〇〇、〇	二、二〇〇、〇	二六、〇四四、二	八、八三三、三	一四四、六	七、〇〇、六
一九三七	四、一七三	三、〇四九、七	三、五八四、〇	二、八〇〇、〇	三二、三三三、六	一〇、九五六、五	一八一、七	一〇三、一
一九三八	五、〇〇三	三、三七五、〇	四、二七二、〇	三、五〇〇、〇	三五、八〇八、四	一二、三五五、九	二四四、一	一三八、九
一九三九	六、一六六	四、三四六、八	四、九〇七、〇	三、九六七、〇	四一、六六八、四	一四、四七〇、〇	三三八、五	二〇七、一
一九四〇	八、三三一	五、〇七〇、〇	五、六六六、〇	四、五九六、〇	四七、〇五〇、一	一八、六三二、八	四八六、二	三六四、一

在評論蘇聯工業成功時，吾人切不可忽略正在變動中之組織上的重要改變。蓋蘇俄之工業，現正在組織之中也，且有驚人之速率，因生產程序，日益複雜，工業之獨立地位，亦日趨堅固，現正從事於生產五〇，〇〇〇種之汽渦輪，極大之淡塞耳機器 (Diesel engines) ，極有力之變壓機，電動機，曳引機以及聯用機，又正在生產優等之鋼鐵，各種溶鐵爐等等。生產擴大之迅速，可於投資之增加，與乎工人生產力之增加，見之，如下表所示：

基本資本之投於  
社會化企業者

於工業者

於運輸者

於地方發電所者

於農業者

（單位百萬盧布，各年之價格）

一九二六	二、二五五	九四二	五二九	七二	一一八
一九二八	四、一一五	一、七〇三	九一五	一七六	三四三
一九三〇	一〇、二八八	四、〇〇二	一、六三八	一二八九	二、一八七
一九三一（計劃中）	一七、六二四	六、六九四	二、八八四	八五〇	四、三一七

吾人前已述及，大部分之資本乃投於重工業。資本之用途有二，重行整頓舊工廠，一也；建築新工廠，二也。投資於各工業（包括發電所）之資本，其分配如下：

新建設	一九二六—二七	一九二七—二八	一九二八—二九	一九二九—三〇
整頓	一三、九	二六、九	三五、二	四五、一
補償	七三、六	六二、四	五七、一	四八、〇
	一二、五	一〇、七	七、七	六、九

每年於新建設一項，必有增加。因以上投資之故，每年基本資本亦大大增加。一九三一年增加工業基本資本約近二萬億，一九三〇年時則僅增加一，四五萬億而已。自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三〇年之間，工廠之開工者達三二三所。於一九三一年，則有五百十八所新工廠開幕，其中如 Magnitogorsk 冶金廠，Kharkov 曳引機廠，Nizhni Novgorod 汽車廠，皆偉大

之事業也。全國經濟中基本資本之增加，如下表：

一九二八年始 一九二八年底 一九二九年底 一九三〇年底 一九三一年底（計劃）

單位百萬盧布，每年之價格

工廠及電力所	五、六五三、一	六、四三七、七	七、二一〇、一	八、四五三、四	一三、四九四、二
工業建築及住宅建築	九、八三三、六	一、一一三、四	一、二六四、一	一、五〇九、〇	一、九六五、九
運輸	一〇、五二〇、八	一〇、六六五、三	一一、〇〇四、九	一一、九六四、四	一三、三〇四、四
商業	四九五、九	四八〇、五	六一五、五	九四八、三	一、四三三、四
農業	一八、三三一、四	一八、七五五、三	一九、六六八、〇	二一、八四六、四	二四、四八三、六

蘇俄之經濟，蓋以社會主義工業化為基礎也。吾人可由酬資勞工，人數之增加，尤於大規模工業所雇工人數目之增加，以見蘇俄經濟發展之速率焉。於一九二三—二四年時酬資勞工之人數（包括農工）約五，八四三，〇〇〇，至一九二六—二七則為八，八六六，〇〇〇，至一九三〇則為一二，四二九，〇〇〇，據吾人所預料一九三一年可增到一三，七一三，〇〇〇。社會主義之計劃經濟，其發展之速，如是驚人，誠使吾人深信，從此後將永無失業之痛苦，而再不受資本主義制度之災害矣。至於大規模工業，勞工人類亦自一九二三—二四年之五三五，〇〇〇，增而至一九二六—二七年之二，四三九，〇〇〇。同時勞工之生產力

亦大有增加。每一勞工，每日之產額，如下表：

一九二二 一九二三 一九二四 一九二五 一九二六 一九二七 一九二八 一九二九 一九三〇

（單位盧布）

六、八 八、六 九、四 一一、九 一五、一 一七、一 一九、八 二二、四 二六、三

勞工之生產力，長此增加，工業品之生產費用遂因之大減，自一九二四—二五年以至一九三〇年一時期中，據預計已減去百分之二十九云云。工業之利潤，則因之大增，一九二四—二五年時爲三八〇兆盧布，至一九三〇年增爲一，七〇〇兆盧布。同時躉賣價格亦減百分之十二。勞工生產力之增加，實可謂社會主義計劃經濟及技術上改造之最大成就。而此成就，乃由於國家電力化之發達，勞工機械化之增加，及勞工自身對於勞工新觀念之養成，所致然。若表現於社會主義下之競賽，「驚人勞工隊」運動者。列寧所謂蘇俄「勞工之新組織」，即指此成就而言。此新組織又使「現代科學及技術上之新成就，與參加社會主義工業之覺悟的工人相結合」。

蘇聯科學之發達，技術上之創造性（initiative）吾人可於工人對工業合理化所提出之建議，經濟各部分中科學研究之盛興，及趨向標準化之工作之緊張，諸端見之。今設一例以明之，一九二九—三〇年時，十部工業中所提出之建議，達六萬三千件，經採用者有四萬六千

件，其綫果節省盧布二百萬萬。

生產之所以增加，除因增加基本資本之原因外，尚有數原因在焉，有系統的改進資本之應用，各工廠中輪值次數之增多，及繼續工作週之普遍應用皆是也，基本資本應用方法之適當，可以下列事實證明之，一九一三年時每一，〇〇〇盧布之資本，其產額爲一，三五五盧布，至一九二六—二七年時則爲一，五七八盧布，至一九二九—三〇年時則爲二，三五五盧布。

資本主義國家，若英，法，德，美其工業之所以發展至如此程度者，實大半假借外力，其所建立之社會的和經濟的基礎，亦大不相同，蘇聯則不然，其解決工業化之問題，乃完全以本身之財力，而其成功也，不但無絲毫之外力可言，且其四周爲敵意的侵略的資本主義國家所包圍焉。

## 農業

國家大規模工業，其發展之速，前文已述，然而農業之發展，則異是。蓋因十一月革命，及戰時共產主義，以及廢除大地主，平均農場大小等緣故，小農場在當時蘇聯農業中佔最重要之地位。農場之數目，一九一六年爲二十一兆，至一九二七年則爲二十五兆，約增加百



分之十九，而耕種面積與戰前比則相差無幾；馬之數目則為戰前之百分之八十，牛之數目則為百分之一百十五。由此可見農場顯然有分解之趨勢。

當恢復時期告終之時，欲以此種個人之小農場為基礎，而求農業之發達，冀能供給市場之需要，乃絕對不可能之事也。農工業究不能交相互進，在發展極速中之城市及工業之日需糧食及原料，勢所不能會合，此乃當時所最困難之問題。工業與農業發展比率，列於下表：

一九二七 一九二八 一九二九 一九三〇

國有大規模工業之總產額 一〇、七六七、七 一三、六六九、〇 一七、三三〇、〇 三、四八八、〇  
(單位百萬盧布，一九二六—二七年時價格)

超過前一年之百分比 一、八 二六、九 二六、七 二九、八

耕種面積總數 一七六、六 一九四、四 三六、〇 三八、九  
(單位百萬英畝)

超過前一年之百分比 — 五、六 七、四 〇、九

耕田畜類總數 六八、三 七〇、五 六七、一 —

超過前一年之百分比 — 三、二 四、八(減少) —

小農場之存在，實足以阻礙一切可能之發展，是以不欲發展農業則已，如欲發展，則惟有從社會及技術上澈底改造，換言之，須從各個小規模之耕種，轉變至農人本身及國家經濟俱有更大利益之農業方法，始克有濟。此即所謂建於新技術基礎之上大規模集合農場是焉。

同時則又須有國家農場之組織，以助其成。於當時，欲達到此人類有史以來所罕有之大事業，其條件無不具備；社會主義工業化之成功，一也；農業機器生產之增加，二也；農業合作之發展，及其影響於農民生產者，三也；農業收穫「契約」制之發達，四也；國家及集合農業之成功，五也；國家及集合農業之成功，又足以使人深信社會化大規模農業之有絕大利益；社會主義者猛烈攻擊富農（*Kulaks*），六也；非資產階級之工人，所組織之團體，扶助國家收集穀類，七也。以上諸素，政府強制實行之者，有數載，每一經濟建設計劃中亦都參入之，又加以私有制度之廢除，結果，農業遂不得不起極大之變化。致使數百萬工人，趨向社會主義農業之新路，而蘇聯經濟之發展亦展開一新時代矣。促進農家集合化之程序，一九二八年時有相當之發展，一九二八及一九三〇其發展更速，及至一九三一年中則集合農場已包羅全國所有農人家族之百分之五十七矣。

蘇聯農業數年來之大成就，其中尤以一九三一年耕種運動之結果為最卓越，而其所以能致此者，則須歸功於集合化之成功。此吾人應加以注意者也，即一九三一年之耕種運動，及全部農業之發展，乃直隸於五年計劃管理之下。以計劃直接統制農業，乃蘇聯國家經濟進一新時代之一特徵也。

農業既如此發展，輕工業，如織物，糖等，亦因之於一九三一年末大有增加，穀類問題

亦從此得一永久之解決。二三年來所欲解決之生活日用品一問題於是時，亦謀得其解決之道。社會主義之農業改造，既告成功，農工業發展不能會合之現象，遂逐漸消滅，蘇維埃政府又因人民集合化之建立，亦得以一舉而掃除富農階級，資本主義最後堡壘，從此攻破，蘇維埃聯盟克服國中一切對敵之制度及階級，而得最後之勝利矣。

蘇聯之國土，佔地球總面積六分之一，疆域既如是之大，則須有相當運輸事業，如鐵路之發展，其理甚明，又何況其國家經濟，發達不已。然而蘇聯於新經濟政策初實施時，其鐵道運輸事業，因世界大戰及列強干涉之蹂躪，陷于悲慘之境地。於一九二四年，甚而於二〇三〇〇輛之火車頭中，實用者尙不及一三，〇〇輛，惟及總數百分之六十三而已，在修理中，亦祇九，四〇〇輛。

雖然於一九二六—二七年時，鐵道運輸總額已略高于戰前。其後數年中，其增加更速。以一九二六—二七年與一九三〇年相比較，則一九二六—二七爲一三六兆噸，一九三〇爲二八兆噸。吾人若以一九三〇至一九三一兩年，各國運輸總額之增加，比較觀之，則蘇聯爲百分之八十，英德約百分之十五，美則百分之四而已，鐵道運輸總額，蘇聯于一九三〇年時爲一三三萬億啓羅米突，佔世界之第二位，能超過之者惟美國而已。運輸總量，蘇聯在世界中之地位，亦由一九一三年之四分之一，增而至今日之百分之七，四。鐵道乘客歷程總數，

一九三〇年時，爲五二萬億乘客啓羅米突，此比戰前增多百分之二百〇八。於此可見，蘇聯鐵道之乘客總數，實佔世界之第一位。

吾人以蘇聯鐵道所經過之地，及其運輸之物品之性質，爲觀察點，而指出蘇聯運輸事業之特點，要亦非無益之舉乎。蘇聯事業最發達者，則爲東方。所謂東方，乃指 *Siberia, The Ala-Kazakhstan* 等地而言。在東方，工業之發展亦最速，吾人可從各大工業聯合組織（*Combinats*）一點見之。東方之所以能致此，蘇維埃政府建築一二，八〇〇啓羅米突，大有原在。從運輸之性質上，又可以窺見蘇聯工業化之全豹焉。在今日重工業在運輸中所佔之地位，決非一九一三年時可比，已大三倍半於當時；機器製造業則大於當時四倍半，燃料工業則大四倍；輕工業及農業，則自百分之七四增漲至百分之八十。

欲資本投資於鐵道事業，實賴於冶金工業及製造機器工業之發展。直至最近數年來投資於鐵道之資，始稍有起色。鐵道制度之所以能適合發展極速之國家經濟之需要，則須歸功於運輸之有系統及合理化。究其原因，要亦由於鐵道之有計劃，極力免除同一物品重複來往於各地，易言之，鐵道之所以能任此重任，乃由於有計劃經濟之存在也。由以下統計，可以見鐵道運輸有效率後之利益。一九一三年時，每一運輸車，平均每日祇行七二啓羅米突，至一九三一年則已行九三，四啓羅米突；每一運輸車頭，一九一三年時行一一九啓羅米突而已，

一九三一年時則行「五三啓羅米突」：鐵道之生產間接費（Over-head cost）一九二六—二七年時爲百分之八十四，至一九三一年時，則降至百分之五十二。其間相差爲何如耶？

鐵道技術上之設備既落後，而又缺乏物質的財源，以供給國家經濟之大量需要，在在顯出根本改造鐵道運輸之技術基礎一事之重要。

### 商品貿易

於工業方面，蘇維埃政府由帝俄時代（Tsarist Russia）傳下基本資本，不在少數，然而於商業方面，則遠遜矣。商業才能之上各種方便之設施，既不發展，即其國中分配情形亦絕不平均。在帝俄時，約有百分之九十四之商業，集中於幾個區域，而此幾個區域在全國人口總數中惟佔百分之二十四而已。其餘區域，如歐部俄羅斯（European Russia）其人口佔全國人口總數之百分之七十五；以及俄羅斯帝國之亞洲部分（Asiatic part of the Russia Empire），則在全國貿易總額中，惟佔百分之六，二而已。貨品物之供給，達於歐部俄羅斯之遠方者，每年每人祇二小銅幣（Kopek）。其達於亞洲部方者，則更少。

然於一九二六年時，全國商品總額已超過于戰前百分之十。一九二五—二六，交易總額達三〇萬億，一九一九—三〇，竟達六五萬億。一九三〇年之交易總額大於戰前約二倍。最

近三年來，每一國民之交易量，以與戰前十三年（一九〇〇至一九一三）相比較，約增加百分之四十一四十五。

零售商品之交易總額，於一九二五—二六，超過十二萬億盧布，於一九二六—二七，則已升漲至一三，五萬億盧布，一九二七—二八至一五萬億盧布，一九二八—二九至一六，七萬億盧布，及一九二九—三〇竟達一九，三萬億盧布。據計劃所規定，一九三〇年之零售商品交易總額將達二十七萬億盧布，則超過一九二五—二六年之百分之一百三十。

零售商品之交易額，所以增加如是之速者，乃由於消費物品，農業物之產額，及農業品之收集，繼續增高不已所致然。例如一九二八至一九三一年之間，服裝增產百分之二五〇；皮鞋增至百分之二四〇；糖之產額，則增加百分之八〇。一九二九—三〇，穀類之收成比一九二八—二九年時增加百分之四十七，在蘇聯之貿易中，有一計劃經濟之要素在焉，所謂「契約」制度是也，即農人農場之產額，由國家及合作商業組織事前訂契約規定之。

雖工業化之發展極速，投資於重工業者日增，然而各種消費物品，頗感缺乏。其主要原因，乃由於小規模農業發展遲緩，不能與工業交相互進故也。又何況當時城市及農村之文化程度已增高。農業之社會的與技術上之改造。既能成功，則種種發生之困難，吾人深信，亦不難於短時期中迎刃而解。貿易之計劃組織，定能使無產階級國家達到用以下方法分配消費

品之一日，即供給工業工人之食品，其總量相等於此輩工人所得之進款。

在今日消費合作社所經營之零售商品，已佔全國總額中之百分之七十六。而一九三一年超過於一九三〇年者，在城市為百分之五十，在鄉村為百分之二十九。其增加，乃隨各地方之不同而異。在 Northern Caucasus 及 Bashkir Republic 為百分之四十，在 Yakut Republic 則為百分之六十一。在 Kirghiz Republic 則為百分之一百四十四。由此可見，其地愈遠，其增加亦愈大。遼遠之邊疆及少數民族所居之共和國，在戰前簡直無商業之可言，在今日則為增加最速之地。吾人若細察商業之地域分配狀況，則蘇聯工業化及集合化之進行，與夫政府政策之大要，亦可思過半矣。

交易額之增加，所以能有今日之成功者，實由於商業社會主義化，進行迅速之故。此乃指合作社及國有商業之發展及商業中私有資本之廢除而言。社會化企業分與私人企業，或計劃與無政府狀態間之競爭，誰佔優勝，可於下表見之：

社會化企業：		一九三二	一九三三	一九三四	一九三五	一九三六	一九三七	一九三八	一九三九	一九四〇
總額	22,000 (百分比)	21,500	22,300	23,500	24,200	25,500	26,200	27,600	28,000	100,000
零售		11,500	12,000	12,800	13,500	14,200	15,000	15,800	16,000	53,500

總貿易額	五、一	七三、〇	七六、一	八三、一	八九、八	九四、九	九六、一
私人企業：							

躉賣	一、〇	八、五	七、四	四、五	一、八	〇、五	—
----	-----	-----	-----	-----	-----	-----	---

零售	六四、五	四六、〇	四〇、三	三六、三	二五、四	一六、〇	六、〇
----	------	------	------	------	------	------	-----

總貿易額	四、九	三六、〇	三三、九	一六、九	一〇、一	五、一	一、九
------	-----	------	------	------	------	-----	-----

此吾人所值得注意之事也，即蘇聯于一九三一年初，其成年人口中約有百分之六十七以上為合作社社員。由此可見蘇聯合作商業制度之發展為何如。及一九三一年七月時，成年人口中所有十六歲以上者，無不參加城市中之合作運動。一九三一年初，加入合作社之股東，其數為六三兆，一九二六年時則為一二，四兆，五年之中，竟增加百分之四〇〇，

商業社會主義化之奮鬥，即使國家經濟生活中商業之一部分，受計劃制度之管轄，乃五年計劃奮鬥中最重要之原素。而五年計劃之奮鬥亦即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之奮鬥也。欲實施五年計劃，則先獲得連接於城市與鄉間之財產，始克奏功。換言之，社會主義的經濟首要地位與數百萬農場間之財產，須獲得之而後可。此城市與鄉村間之連結，吾人名之曰「*Связь*」，迄今為止，由商業支持之也。至於五年計劃奮鬥之目的，則在恢宏人民之幸福，及減低物品之價格。



誠然，物品之價格，日見減低矣。一九二七至一九三〇，城市消費合作社（當時經營工人所產物品之百分之八十）零售物品之指數，減低百分之八，工業品之價格，則減低百分之十二左右。鄉村中合作社之價格，則共減少百分之十。如以農家之預算表細察之，則又可見一九三〇年時私販之供給於工人者，祇為交易總額中百分之二，五以至百分之二，五。（畜類販賣，不在其內）然而於最近將來，國家及集合農場發展後，私販於畜類範圍內，亦必減至最小限度，於穀類可以見之。

私人市場在今日蘇聯已不足以為輕重。因集合化之成功，喪其供給糧食之基本，則私人市場不僅得不崩潰之原因有在矣。私販及投機者，既不能與社會主義化強有力之發展相抵抗，則惟有出於消滅之一途。目今其範圍既限於本地市場，又無將來一線之希望，則亦惟有奄奄待斃，以延時日耳。

供給與需要，稍有改變，私人市場立即受其影響，價格亦立即增漲。此種反應，於私人市場活動範圍縮小時，更顯猛烈。有人謂私人市場價格病態之升降，乃由貨幣流通情形而起，是乃淺陋之見也。

按照生產與建設之計劃及其社會目的，以圖再度分配生產力量，至須有一商品交易之計劃組織，相伴以行，乃蘇聯實行計劃經濟數年來所得之經驗也。所謂一九二三之「買賣恐慌

丁（Selling Criteria）實證明計劃經濟（當時在發展之初期），如有集中充分權力，以統制國家經濟之主要財源，及不受私有制度之約束，則確能安然應付經濟發展所引起之困難。在另一方面，由規定私人貿易之價格所得之經驗言之，又可證明此種規定，屬於徒然，及私有資本主義的計劃經濟，不能實行。

商品交易之有計劃的組織，其最顯之利益，於減少一般生產間接費用一點見之。蓋蘇聯之商業，在極力減小貨物流通之費用，換言之，即使生產者，轉入消費者之手，其間之費用減少是也。同時又極力改革商店之任務，使其深入城市及鄉村勞動民衆間。其結果節省無數百萬盧布，不啻在蘇維埃制度之下，增加一新財源，以加速國家經濟之發展。

貨物之運輸，以計劃實行之，其本意在減少貨物運輸之距離，是故殫心竭慮，以謀商業網及貨棧縱橫布置於國中。運輸貨物，按諸計劃之後，因輸運之無組織而受之枉大損失，從此免去，此種損失，在資本主義無政府狀態競爭之下，則罕有能免去者。而此種損失遭受最大者，厥維勞動階級耳，美國於一九二七年因廣告而用去之金錢，其數約一，六萬億元，而用於興辦公共衛生及醫院者，（所謂自由社會服務），則惟廣告費用之百分之十一至十二而已，吾人於此可得此種損失之概念矣。所以無怪乎有數種消費品之生產費，超過於零售價格之百分之五十也，在蘇聯之交易中，則商業生產費用之低，實不能與資本主義國家，相提並

論。一九三〇年蘇聯消費合作社之生產費，總數祇一，五萬億盧布，當時所經營之零售物品約百分之八十，以此與美國單稱廣告一項比。祇爲其半數而已。一切與消費合作社有關之費用，在今日亦惟及分售物價之百分之十二。是故，在蘇聯商品交易之一般生產間接費用與零售價格總額之比率，惟及美國三分之一而已。

## 財政

轉入新經濟政策，不但國家經濟之迅速發展，有以助之，即蘇聯財政制度之大改進，亦有以促成之也。顧新經濟政策實施之初，財政方面之主要工作，爲堅固財政制度，創立一穩定通貨，編制預算表，及組織信用制度，蓋當時預算表，信用，及財政之計劃，實與有系統者，相差太遠。自一九二二—二三至一九三—二四預算表係在通貨暴落時編成之，因預算不足而以物貨捐助之制，直至一九二三—二四始行廢除，於一九二四—二五年時，第一次有一穩定之預算表，始能實現。

於一九二二—二三年時，曾發行新貨幣三百九十四兆盧布，以補預算之不足，此數目約抵國家總歲入之百分之二六，九；然而於一九二四—二五年時，預算表已能收支相等，不必求助於新貨幣之發行，此不只爲預算方面之大成就，且亦爲蘇聯全國經濟之大成就，新貨幣

之停止發行，及改革後幣制單位之穩定，要為財政計劃及財政組織中之主要原素。

蘇聯之國家預算表於一九二三—二四年為二，四兆盧布，至一九三一則增高至二一，八兆盧布。七年來，其增加者，竟達百分之八百。在此七年中，國家之歲入，大半賴於稅賦。國家經濟中社會化企業愈發展，則其擔負之稅賦亦愈多。一九二四—二五，國有事業及合作社在稅賦總額中擔負者為百分之五十，及一九三一年竟達百分之九十。

吾人論及蘇聯間接稅之重要時，有一點應不可忽視，即蘇維埃國家歲入之社會結構與資本主義國家之原則，絕不相同是也。在蘇聯無一大宗財產，人民之收入，相對之均等，故其租稅之負擔亦相同者。蓋蘇聯已廢除倒行逆施之累退租稅制度 (Regressive Taxation) 即窮人之租稅負擔重於富人之制度，而採用一以納稅人之收入為比例之制度矣。以稅率不同為方法之間接商品稅 (excise duty) 之徵收，如奢侈品抽稅最重，實為無產階級租稅政策之最可靠之工具。一方面為使收入微薄者之稅賦負擔減輕，計政府又採取直接累進稅，及以階級為區別之稅率。不但此也，且證明租稅可用之以限制不合式之消費，如火酒是。雖則，在農人極衆之國家如蘇俄者，禁止火酒之出賣，其效甚微。然而能以重稅征於火酒。在今日，征於火酒者，約抵其原價之百分之九十二。每人消費火酒之平均數量，遂比戰前減低百分之六十。吾人於此庶幾可見蘇聯租稅制度之特點矣，其特點為何，即以計劃利用租稅，使資本重

行分配於社會主義經濟各部分及各部分之組織間是焉。

一九三〇年之租稅改革，在其改良財政計劃，使徵收之手續簡單，及費用減少一點言之，實屬重要。自實施制度後，從前五十五種不同之稅，征於社會化企業者，現則總合而為一單簡之商品交易總額稅，直接付與中央政府。

吾人進而討論租稅之負擔，及分析社會主義經濟之增積時，尤應分清蘇維埃與資本主義的租稅之不同點。蓋在蘇聯，租稅另有一特別的功用，即以租稅為實行國家經濟計劃之財政來源之一。在資本主義國家中，則惟以租稅為維持政府及供養軍隊而已，若吾人以蘇聯預算表分析之，即可見一〇，八萬億盧布之總歲入中，以六，三萬億盧布用於管理國家經濟。二，五萬億盧布用於文化目的。甚而吾人蘇俄制度中有許多免稅之條目，如地產，礦，森林租金，利潤之一部分；及有產與無產階級担负租稅之不同等事實而不論，又甚而吾人置蘇維埃與資本主義國家對於租稅觀念絕對不相同而不顧，吾人亦決不可即據此而斷言蘇聯之人民，負稅太重。願吾人切不約束自己之眼光，而僅僅於租稅制度之形式分晰也。

在蘇聯，聯邦及地方稅（免稅者歸入商品交易總額中，不在其內）佔國家總歲入之百分之二五，以與各國比較觀之，英國則為百分之一九，八，法則百分之一九，六，意則百分之二五。在蘇聯國歲入中，有一項特別條目，即國家借款之收入是。且過去數年來，此宗

借款甚爲發達，成爲蘇聯預算表之通常部分。此項借款，乃持政府之信用，而其目的則在生產也。即以私商之眼光觀之借款於國家，亦屬有利之舉，蓋政府以資本投入工業，其利潤決優過於國家債務之利息也。政府以國家借款爲名義而得之信用，於一九二三年十月時爲五一，九兆盧布，及至一九三一年一月一日已達一，五九四，六兆盧布矣。按照計劃，所規定，國家借金，每年將有增加。一九三一年五年計劃第二期借款，即其成功中之最顯著者。此期借款於二十五天內，完全爲各城市所承銷，並且於二月以後，超過一，六萬億盧布。此誠出於計劃意料之外，實可顯見蘇維埃政府之社會基礎，爲如何廣闊，勞動民衆之擁護實業化及集合化之政策，爲如何熱心。

以現今蘇聯預算表出方面分析之。則大半用於管理國家經濟，其用於文化目的者，七年來增加百分之七〇〇。而惟以百分之七，用於國防，如與法國比較之，則法國預算表中之百分之五十，乃用於國防，包括撫恤金等。至於蘇聯，其國防費用，惟及國民所得中之百分之二而已，而在法國，依據官報所載，達國家歲入之百分之四、五。蘇聯之預算表中。其用於行政及軍隊者。則爲總歲入之百分之三，而在戰前之俄國，則爲百分之九、三，在英國則爲百分之五、五。

蘇聯之聯邦預算表，乃是由全蘇聯之預算，及七個自治共和國之單獨預算二部分合併而

成。因蘇聯之預算表係屬混合性質，是故每年增加不絕之基本金，得以流入最落後之共和國。Control Asiatic Republic, Caucasian Federation, White Russian, Republic, 等國預算之充實及增加，皆足以證明蘇聯對於少數民族之政策爲何如。

地方預算表每年由聯邦預算表供給大宗資助。所以地方預算表在一九二二—二四年時祇爲六五〇兆盧布，至一九三一年則已增爲三、八萬億盧布。而地方預算表中，大部分之費用，乃用於文化目的及經濟目的，自地方於財政方面自發自動之發展，吾人可知蘇聯經濟組織之基本原則矣。此原則爲何？即計劃之集中，與夫行政之分權是也。

預算表之外，其他在蘇聯財政計劃及組織中佔重要地位者，則爲信用制度。其主腦爲國家銀行，而國家銀行同時又爲蘇聯發行貨幣之中樞機關。集中所有財政之源流於其一人之手，全體總動員於五年計劃之下，按照計劃所設計，重行分配財源於各地方。可知蘇聯之信用制度，實乃計劃及統制國家經濟之最重要之工具。此制度亦即經濟關係之焦點，中央之清算處，及組織的集中的社會主義經濟之現款準備處。五年計劃發展到如何程度，可以由此制度見之，故謂爲經濟生活之最靈敏憲表可也。而且此制度可指示在五年計劃下，如欲經濟繼續進行，所不得不採取之步驟。

信用制度之主要事業，當然是在利用信用以扶助國家經濟之發展，但蘇聯於一九二一—

二二年時所建立者，除此以外，另有一相等重要之工作，此工作為何，即介紹健全財政之原理於社會主義企業中各種專業之經濟關係內。如促進蘇聯各組織之經濟生活，使之有條有理，以及強迫實行會計簿記，報銷等正當方法，皆此制度所為之善舉也。此種有組織之任職，實至最近仍屬重要，蓋因在國家經濟新環境及新形式之下，亟須有一真確之報銷也。

國家經濟各部分之發展與信用制度之發展相伴而行者也。信用制度之財源，一九二三年十一月一日時為八三五兆盧布，至一九二七年十月一日即已達六、三萬億盧布。信用制度之資本基金一九二三年時為一五六兆盧布，至一九三〇年則已增至一、四萬億盧布，短期貼現及短期借款一九二三年時為四一〇兆盧布，至一九三〇年十月一日則已增至四、三萬億盧布。以計劃分配龐大財源於國家經濟之各部分間，乃蘇維埃經濟發展中，一最重要之要素也。

信用之有計劃，較遲於國家經濟各部分之有計劃。然而自有計劃之後，其成效立即顯著。如，一九二四—二五其完成每季信用計劃所預計者，約為百分之九九、二以至一〇八、四。一九二五—二六則百分之九五、六至九九、六。社會主義經濟既發展而堅固，計劃之方法又美而且備，此一部分之經濟關係，遂亦建立於計劃之基礎上矣。一九三〇—三一年，信用制度改良後，商業的信用。即於當時廢除，進而採用直接的銀行信用，蘇聯財政計劃。於是進入一新時代焉。



信用制度之所以能如此成功者，則乃由於社會主義成分在國家經濟中之發展，及計劃在當時地位之超越所致然，其後，則反而督促蘇聯經濟計劃原則之進行。信用改革又使經濟組織與信用制度間之關係，與夫各種經濟組織間之關係，歸於簡單。然而由信用制度所創立之新關係，其機能能否適當。則須視乎國家經濟之效率而定，此乃目前一經濟問題也。

自信用制度改革後，所有短期信用咸集中於國家銀行之手，國家銀行遂成爲蘇維埃國家經濟中之惟一清算處。從此國家銀行集中所有經濟組織，財政機關，以及各種特別銀行之財政關係於其一人之手，又從而規定之。在今日特別銀行所經營者，惟長期信用，實業的財政建設，農業，合作社。及地方服務而已。

國家計劃經濟中，尚有一重要之工作，即以計劃統制貨幣之流通是矣。因當時全部國家經濟之進行，皆有計劃可循，是故欲以計劃統制貨幣之流通，亦屬易事也。

吾人如欲明瞭蘇聯貨幣流通之情形，則必須以當時貨幣流通之總額及國家經濟各基本部分之發展狀況，一一比較之。於一九三一年時貨幣流行之總數則爲一九二五—二六年之三倍，其增加數，大致與實業生產，商品交易總額，及鐵道運輸之所增加者相等。在今日之蘇聯，則其流通之貨幣，超過於戰前百分之七十八；於一九三一年時之工業產額，則超過於戰前約三倍，鐵道運輸則比戰前增多二倍，商品交易總額則於一九三〇年時已三倍於戰前矣。

一九二九—三〇年之下半年載，曾發行鉅量之新貨幣。此事與信用改革之轉變時期，大有關係。蓋當時中產階級報紙羣起詰難，其結果遂使蘇維埃之通貨發生搖動。中產階級之攻擊，實則早在意料之中，蓋於一九三〇年十月至十一月之一特別節（Special Quarter），已能見之。在此時期內，則與以前大不相同，蓋能不依賴於通貨膨脹，購買四季之穀類，其數之巨，約有二萬億盧布。至於蘇聯人民對於通貨之信仰，則吾人可於以下事實證明之。於一九二九—三〇年時，私人之財產存於儲蓄銀行者，其總數為一三〇兆盧布，及一九三一年之初，則為一二一兆盧布。

信用制度，如預算表然雖屬十分重要，但亦蘇聯財政制度中之一原素而已，不足持之以觀蘇聯財政之全豹也。欲觀蘇聯財政計劃之全豹，則須從財政之總計劃中尋覓之。上所言及之財政總計劃，乃包括及會合各種分立的財政計劃而成，如預算表，信用計劃，實業財政，運輸，農業之社會主義化部分是。從根本上言之，財政總計劃即一計劃，用以組織財富之積集，及經理各種經濟的和文化的建設者也。

財政總計劃集中所有社會主義經濟及財政機關之財源於其手，如一四面滙聚資金之大川然。所有財政機關之工作，則由計劃平亭劑酌之。因此，各部分間互相調劑之計劃，遂有設立之可能，而使財政計劃，益臻於完美。

財政總計劃，並不如聯邦預算表然，乃以私人機關及經濟組織之財源，亦在籌畫之列，且預設一方針，使彼等有所適從。顧國家經濟社會主義化，日益發展，則此財政總計劃之活動範圍亦愈擴大，國中每一財政關係，此計劃逐一佔取之，財政總計劃之主要財源，則為社會主義化經濟所積集之財富。此項財富，雖經一度跌落，改少不小，然而於一九三一年時，尙佔財政計劃總預算表中（共三〇二萬億盧布）之百分之三十八。

### 五年計劃及其完成

所謂五年計劃，自一九二八—二九年起，以至一九三二—三三年止，為蘇維埃之國家經濟，謀社會及技術上之改造之計劃也。

五年計劃投資於全國經濟中之資本，其數達六四、四萬億盧布。五年前，則惟二六、五萬億盧布，電業者為三、一萬億盧布。據計劃所預計，以上投資之結果，將使蘇聯之基本資金將自一九二七—二八年時之七〇萬億盧布，增漲至一九三二—三三之一二八萬億盧布，換言之，即增加百分之三十二。是即工業全部之基本資金，將由九、八萬億盧布，增至二九〇一萬億盧布，電力站則由一萬億盧布，增至五萬億盧布；鐵道運輸則自一〇萬億盧布增至十

七萬億盧布；農業則自二八、七萬億盧布，增至三八、九萬億盧布。又據五年計劃所預計，工業產成品一九二七—二八。一八、三萬億盧布，至一九三二—三三將增至四三、二萬億方布，農產物品則自一六、七增至二五、八萬億盧布，鐵道運輸則自八八萬億，增至一六三萬億，啓羅米突。全國經濟之淨生產，國家之收入，預計自一九二七—二八年之二四、四萬億盧布增至一九三二—三三年之四九、七萬億盧布。

五年計劃以投資於工業之資本總數中百分之七十八分配於製造生產品 (Producers Goods) 之各部工業，據計劃預計，各部之產額，將增加百分之二三〇，以此與國家大規模工業全部比，則增加約百分之一八〇。關於電力，五年計劃規定建立四十二個電力站，其中包括者如淡南浦河 (Dnieper River) 水力電站，雪浮河 (Svir River) 水力電站，燃燒莫斯科煤之波勃列考夫 (Bobrikov) 電力站，以及位於塘南 (Donets Basin) 及徐勃斯基 (Zerebaky) 電力站等等。電力之產額預計於一九三二—三三年。可達二二萬億瓦時，一九二七—二八年則惟為五萬億瓦時而已，關於冶金廠，五年計劃亦規定建立數所，此則與鋼鐵之生產，極有關係，一九二七—二八鐵塊之產量為三，三兆噸，至一九三二—三三將增為一〇兆噸。至於機器製造工業，則五年計劃預備於改造舊有工廠外，多多建築新工廠。此等新工廠包括在史太林格 (Stalingrad) 之汽車廠，在烏蘭爾 (Urals) 之曳引機廠，在斯浮洛夫 (Sverdov) 之

重機製造廠；及在羅斯托夫（Ростов）之農機製造廠等等。五年計劃之下，社會化企業在全國之總生產額中，規定欲增加者，如下表：

工業	自	一九二七—二八	一九三一—三三
農業	自	八〇%	九二%
零售交易	自	二%	一五%
	至	七五%	九一%

五年計劃開始二年來之成績，不但證明五年計劃之可以實行，及五年計劃可以指導國家經濟發展之途徑，並且証明其發展之迅速，實超過於五年計劃所預計者。兩年來（一九二八—二九以至一九二九—三〇）五年計劃之成績，可於下表中見之：

投資	（各年之價格）	五年計劃規定者	實際成就	成就之百分比
一，於社會化企業者	一一、六五三	（兆盧布）	一三七六二	一〇八·八
二，於國家大規模工業者	三、九九〇	（兆盧布）	四、六〇五	一一五·四
三，於農業者	一、七一九	（兆盧布）	二、三九七	一三九·四
四，於運輸者	二、五〇四		二、六八六	一〇七·三

2 國家大規模生產之總生產額 (包括食品工業) 一九二六—二七價格

二六—二七價格

一, 甲類

一一、四七六

(兆盧布)

一三、七六四

一一〇.三

二, 乙類

一六、八六一

(兆盧布)

一六、六九二

九九.〇

3 耕種面積 (總面積)

二二九.〇

(英頃)

二四五.八

一〇二.八

一, 穀

一九六.三

(英頃)

一九八.〇

一〇〇.九

二, 棉

二.四

(英頃)

二.六

一〇八.四

三, 糖菜

一.七

(英頃)

一.六

一〇五.九

4 出售穀產額

一七.三 (兆米突噸)

一八.三

一〇七.〇

5 鐵道運輸

三五〇.九 (兆米突噸)

四〇.二

一一六.六

注, 一英頃等於二.四七英畝, 一兆突噸等於二, 二〇四.六磅。

於上表中, 可以見重工業與農業超過於五年計劃所預計者為幾何, 其超過最甚者, 以耕種面積中工業的植物, 以及出售於市場之穀類。

國家經濟中各部分之增加, 超過於五年計劃所預定者, 更可於國家收入同時增加一點見

之。自一九二一至三一，十年以來蘇維埃之國家收入增加達百分之二百。一九二一年之收入，則爲一九一三年之百分之五十；至一九二六—二八年，恢復時期終了時，則國家收入已達一九一三年之百分之一〇二矣；及一九三〇，竟升漲至一九一三年之百分之一五六·三。

由以下數目中，可以見於改造時期中發展之迅速爲何如：於一九二九年，國家之收入，增加百分之八·一，於一九三〇年，則增加百分之二〇·八，於一九三一年，按照計劃所定，增加百分之三十九。以此與革命前之俄國比，則革命前之俄國，國家之收入，自一九〇〇以至一九一三，惟增加百分之四十，每年之增加率，惟百分之三而已。觀乎美國國家收入之增加率，則每年自百分之四以至百分之五，僅某五年中，每年之增加達百分之九。

雖則蘇聯之人民，日漸繁盛，（每年平均增加三，五〇〇，〇〇〇）然而每一人民之平均收入（Per capita income），仍有增加。於一九三一，每人之收入，每年爲一〇〇，四盧布，至一九二七—二八，以一九二三年時之價格計算，則每年每人爲一〇一，一盧布；至一九二八—二九，增至一一一，九盧布；至一九二九—三〇增至一二六，五盧布；至一九三〇，增至一三七，五盧布由此可見，一九三〇年每一人民之收入，其超過於一九一三年，竟達百分之三也。

尙有一點，吾人應加以注意焉，即所論人民收入之階級結構，在今日乃與一九一三年前

，完全不相同是也。蓋地主及大中產階級等，已相繼消滅。如吾人注意蘇聯今日之民衆爲無產階級一點，則以今日每一人民之收入，與革命前相比，實非上述數字所能盡述者矣，蘇維埃國家收入之社會結構，可於以下事實見之。即在一九二六—二七年時城市及鄉村間中產階級之收入，於國家之總收入中，早已爲百分之三，五而已吾人爲比較起見，願一述資本主義國家之狀況，則在此等國家中不勞而獲者之收入，佔國家總收入之百分之四十至五十，然而其國中資本家階級之人數與勞動人民比，則英國爲百分之二六，德國爲百分之八，五。

關於國家收入，五年計劃之結果，實超過於預計。依照計劃所定，一九二八—二九國家收入爲一九一三之百分之一二〇，八。然而實際上已達百分之一二三，八。一九二九—三〇爲一九一三之百分之一三九，八，而實際上達百分之一四三。

因國家收入，既日見增加，而全國收入用之用於國有企業及合作實業之部分，在比例上、亦有驚人之增加，此誠值得注意之好現象也。在此方面言之，實際上之成就，實超過於五年計劃所預定者。國家收入中，各部分之負擔（以一九二六—二七年時價格計算），列表於下：

國有事業	一九二八	一九二九	一九三〇	一九三一
	四三·九（百分比）	四八·二	五二·四	五六·二



合作事業	九·八	一四·一	二一·三	二五·五
社會化企業總數	五三·七	六二·三	七三·七	八一·七
私人企業	四六·三	三七·七	二六·三	一八·三
總結	一〇〇，一	一〇〇，一	一〇〇，一	一〇〇，一

社會主義的經濟形式，其發展之迅速，誠出於五年計劃預計之外。於一九三〇年時，社會化企業已能於國家經濟中據一穩固和優越地位，是以蘇俄確已進至社會主義之時期矣。於一九三一年時，社會化企業於久為資本家所盤據之農業中，已佔一優越地位。及乎一九三一年之終，社會主義經濟，遂建立於不技之基。社會主義之勝利，可於下表見之：

基本資金	五二、五（百分比）	五六、二	六二、	七一、三
工業之總產額（包括）	八四、四	八九、五	九四、	九七、六
出售於農業品產額	四、四	八、二	二九、	五五、〇
零售貿易總額	七八、〇	八八、六	九四、	九七、七

階級力量之關係中，其改變既如此激烈，則無怪乎於一九三一年五月舉行之第六次蘇維埃大會，宣言曰：「在吾國家中，對於社會主義之成功，已不再疑問……蓋蘇聯社會主義之成功，已完全證實之矣。」

## 概論

願蘇聯自第六次蘇維埃大會通過於最近十年內經濟及技術方面，須超過各資本主義國家之議案後，即產生一口號。此口號為何？曰：「於最短之歷史的時期內，勝過各主要資本主義國家」是焉。誠然，蘇聯今日之國家經濟，其發展之迅速，勝過於資本主義國家，乃不容疑問之事也。『資本主義國家自大戰後，乃至於一九二九—三〇之恐慌以前，關於生產不惟隨時變異 (Marking time) 抑且其增加之緩慢成爲常態。即以發展最速數年論，資本主義之經濟亦決不能及蘇聯於萬一也。吾人如以過去三年來，各國生產數量一增 (+) 減 (-) 指數比較觀之實一有趣味之研究：』

	一九二八	一九二九	一九三〇
蘇聯	(十) 二六、七	(十) 二四、八	(十) 三五、八
美國	(十) 四、七	(十) 六、三	(一) 一八、三
英國	(一) 五、二	(十) 七、九	(一) 一〇、八
德國	(一) 〇、一	(十) 一、八	(一) 一七、二
法國	(十) 一六、六	(十) 九、八	(十) 〇、六

於上表中可知若以今日工業生產品之生產量指數與戰前相比，則蘇聯超過於各資本主義國家。德國及英國之工業生產品於一九三〇年時反而低於戰前之數量，而蘇聯於是年竟增加兩倍於一九一三年。蘇聯一九三〇年之指數，則不但超過於法國，且超過英國焉：

一九一三—一〇〇

蘇聯

二三八、三

美國

一八八、五

英國

八二、二

德國

九一、一

法國

一四〇、四

一九三一年之蘇聯工業生產品總量，將三倍於戰前。

蘇維埃經濟之進步，實足以使人驚慕，在今日蘇聯工業中各主要部分之產額，無一不超過歐洲各國者。以煤鐵為例：蘇聯生鐵之產額，按照計劃所定，一九三一年時將大過於英國一九三〇年之產額，而相等於德國一九三一年之產額百分之八二、五。於此，吾人應加以注意，即各資本主義國家，於一九三一年時，其生鐵之生產額，尚在跌落之中也。

至於鋼鐵之消費量，煤炭之生產額，電流之出產量，以及機器之製造數。蘇聯則於一九

三一年時超過法國。電流之出產量，則蘇聯早已超過於英國矣。

在今日，蘇聯已是全世界農產物最大之國家。單以一九三一年社會化企業之耕種面積而論，已大三倍於加拿大，而相等於美國之半數。至於機器之動力，則為歐洲各國中之第一位

實施五年計劃兩年來所得之經驗證明五年計劃能於四年完成之，而實際上，有幾部分重要之工業，其完成期，尚不到四年。五年計劃完成之日，即蘇聯與德國爭奪世界第二工業國位置之時矣。

三四年後，蘇聯行將居歐洲之第一位。此乃指工業品產量，尤是指紡織物之生產及消費、工業之電氣化，每一工人之機械力量及工業中工人之生產力而言。工人生產力，最屬重要。列寧曾言曰：「在長時期中，勞工之生產力，實為左右新社會秩序之勝利之最要原素。而資本主義所創造之生產力，則為農奴所不知。是故資本主義終將歸於失敗，蓋因社會主義能創造一新的更高的勞工之生產力也。」

蘇聯之成功，抑有秘密者在耶？數百年來，事事落後於資本主義之蘇聯，今則一躍而共經濟，社會，文化，有人類有史以來所罕有之進步，其原因何在耶？吾人解答之曰：此乃社

會主義計劃經濟之結果也，新的社會秩序之結果也。

史泰林有言曰：「無一舊階級，不論封建的貴族階級，或是中產階級，能挽救蘇聯於水火中者。蓋此等階級，不但無肩任此項工作之能力，且從未會解決一問題，使人滿意者。」

昔日之勞動階級，爲人之奴隸，今日之勞動階級，則轉而爲所有生產工具之主人，又爲所有社會主義生產品之主人，數百萬之勞工之生產力量和創造能力，從此得以發揮盡致。不  
但此也，在現在資本主義之國家，大多數之人民，成爲謀生存而後勞動，（同時又有數百萬  
人民，因失業而奄奄待斃），然而在蘇聯則不然，勞動已由奴隸之地位，轉而爲光榮之事，  
此乃社會主義對於勞動之新態度，亦足以解釋蘇聯人民對於勞動熱心。蘇聯人民對於勞動之  
熱心，可從其社會主義競賽，挺進隊，大批之發明，及工人所提出合理化之建議，見之，凡  
觀察蘇聯而無偏見者，類能道之。

男女之平等，可於各方面見之，此不啻增加從事於建設經濟及文化生活工作之有力助手

• 完全廢除國中不平等之現象，實乃幾百萬萬人民，所以能有發展之一日之主因。此等人民，  
從前皆係下等僑民而爲統治階級所置之不顧者也。

資本主義經濟行爲之原則，今則由社會主義之原則，取而代之。在資本主義之下，社會  
生產之動機爲利潤，爲私人之利益，而在社會主義之下，則以社會生產力發展之最高度爲標

準，而為人民之生活，謀有系統之改進者也。此使社會生產力，不受私人財產之束縛，在今日，欲以各地方經濟情形之不同，相同工業之聯合，及各種事業之最高限度為觀點，而使生產力之分配，非但合理而且有效率，實屬可能之事。在此點言之，私人土地財產之廢除，十分重要。蓋因土地私產廢除之後，然後有合理組織之可能。合理組織可能之後，然後能以集合為原則，建立大規模工業，應用最合理之耕種方法；如是而後，國家經濟各部分，始有發展之可能，而得以促進農民之物質及文化程度焉。此種改進，在資本主義之下，則絕對不可能，因其為利息，抵押及重利等關係所束縛。

蘇聯之計劃經濟，有數優點在焉：使國家經濟於生產，流通，及分配，免去極大之無謂的耗廢，一也；如在資本制度下，則屬不可免；無寄生主義，投機，及欺騙等之存在，二也；免去資本主義生產之無政府狀態，因而消費落後之害，三也。職是之故，社會主義之計劃經濟得以獨立於現代社會之崩潰勢力中，而無生產過剩之恐慌。蓋在蘇聯之國家經濟中，決無市場恐慌一事，而得資本主義之國家中，則屬司空見慣。社會主義計畫經濟，其發展生產力之目的，乃在謀人民之繁榮也，同時計畫經濟產生一無限度之需求，因之又鼓勵生產，為生產力之發展，開一新田地。總之，計畫經濟，不但指導社會生產，而且創立一新的及有力的生產力。

蘇聯之計畫經濟，在今日僅經過其發展之第一步及最複雜之階段而已，仍須繼續努力，與阻力障物相奮鬥也。蓋有許多困難，尙未完全解決，例如人民之文化程度，其進步若是之速，其日常需要，當然隨之日見增高，則其需要應如何滿足之；以及現代技術上之方法，應如何謀得之，合理化之組織應如何結構之，皆尙未解決之問題也。蘇聯今日仍感缺乏有技術而可靠之專家，即一明例焉。

然而以上所述之困難，乃由於蘇維埃政府自帝俄傳統下之國家，其經濟及文化，落人太後之故，亦由於國內資本家之反抗，及資本主義國家之敵意所致然。然而蘇聯以空前絕後之速率，恢復落後，使仇敵階級，無立足之地。則所有之困難，惟發展之困難耳。總之，五年計劃之成功，將為蘇聯國家經濟立一不拔之基礎，使其發展更能迅速，而為人類社會之歷史展開一最光明之社會主義一頁。

## 我們的經濟原則：

- △爲個人謀生存之安全並改進其智能與境況計，確認私有財產。
- △爲社會謀公共幸福並發展民族經濟與調劑私人經濟計，確立公有財產。
- △不論公有與私有，全國經濟，須在國家制定之統一計畫下，與國家與私人各分別擔任而貫徹之。
- △依國家計畫使私有財產漸趨於平衡與普遍，俾得人人有產，而無貧富懸殊之象。
- △國家爲造產之效率增加及國防作用計，得以公道互酬平和方法移轉或吸收私人生產或  
其價值，以爲民族經濟擴充之資本。
- △謀民族經濟在世界經濟上取得平等地位並得補助之，並促進世界經濟問題之解決。





再生雜誌 第二卷第五期 民國廿三年二月一日發行

北平西城石板房

編輯者 再生雜誌社

發行者 再生雜誌社

本 刊 價 目				
國內各埠不另加郵費 特刊訂閱者不另加價	國外加郵費每冊二角	全年	半年	零售
		十二冊	六冊	每冊
		二元	一元一角	二角

廣 告 刊 例				
廣告概用白紙黑字 如用色紙或影印價目另議 繪圖刻圖工價另議 連登多期價目從廉	普通	上等	優等	特等
	正文前後	正文中間	封面及底面之內面	底封面之外面
	四十五元	五十元	六十元	七十五元
	二十四元	二十八元	三十五元	
	十三元	十五元		四分之一

張君勳先生著：

# 「史泰林治下之蘇俄」

實價  
一元二角

著者先後三次遊俄，本書即以其一九三一年在俄所得之印象為基礎。所搜集之材料，直至一九三三年為止，與現時國內一般帶了顏色眼鏡寫蘇俄的，迥不相同。著者在其自序中說：「……我之注意俄年，十餘年如一日，文中所記，乃吾自身帶了問題，以求答案於俄都，事所得之當地之聞見，昔之所以反俄者，為其反對民治也，私政權於一黨也。今之所以贊俄者，為其創造的成績也，為其政策之漸合於人性也，所以贊否者，皆是非利害之公言，非黨派左袒右袒之私見也。」就可知這書的價值了。

(甲) 總論：一，十六年間之縮寫 二，蘇聯政策之國家本位

(乙) 蘇俄之經濟財政：一，五年計劃(上) 二，五年計劃(下) 三，集合農場

四，國營農場 五，蘇俄制度下之私人生活 六，第二個五年計劃 七，一九三二年

蘇俄之預算

(丙) 蘇俄之政治：一，階級國家或曰無產專政 二，共產黨之組織 三，近年之黨爭

四，一九三一年史氏之「六點演說」 五，一九三三年一月史氏之演說

(丁) 蘇俄之思想教育：一，共產黨思想之定於一尊 二，蘇俄哲學界之近況 三，教育制

度 四，近三年蘇俄教育之轉向

(戊) 國際：一，第三國際 二，第三國際與中國之革命 三，新疆門外之鐵道關

再生雜誌社發行部啟